

經濟轉型中的應對策略與制度分歧： 溫州與無錫

劉雅靈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從制度論出發，強調在地方比較制度優勢與制度互補的影響下，溫州與無錫如何回應日漸激烈的中國市場競爭與國際金融危機？本文強調溫州與無錫的地方行動者，如政府經濟治理能力的強弱、行業商會的外向連結或自我封閉、企業獨立或依賴的經營精神，均影響地方採行不同的應對策略做經濟轉型，以回應市場競爭的挑戰。溫州已從過去割喉式準自由市場競爭走向以商會協調為主的市場經濟，而無錫從過去地方政府產權所有的公司法人走向以地方政府協調為主的混合市場經濟。本文認為在應對策略選擇中，溫州開放包容與外向連結的行業商會，扮演制度企業家角色，以豐富的資訊、理念與資源做制度創新，防止市場失靈。相較之下，無錫地方政府雖以強勢姿態干預經濟，如積極引進外資、推動高科技產業升級與密集式成長、產權私有化改革、組織企業集團上市、營造城鎮總體規劃、普及社會福利等，但無錫始終追隨中央政策之後，並造成許多資源浪費與效益低落，故無錫地方政府僅呈現弱勢制度企業家角色。溫州與無錫在制度變遷過程中，不僅出現舊制度元素重新組合的手工修補，而且出現新、舊制度元素相互混合的層疊交替，並在各自原有不同的比較制度優勢與制度互補約制下，走向分歧的經濟轉型路徑。

關鍵詞：比較制度優勢、制度互補、制度企業家、制度變遷的手工修補與層疊交替

Coping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al Divergence i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of Wenzhou and Wuxi

Yia-Ling Li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ways in which Wenzhou and Wuxi,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e local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develop different coping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intensified domestic marke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their respective paths toward market transition when China is embracing global capitalism. 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the outward bridging character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Wenzhou that assume the role of a strong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to initiat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local transition from the semi-laissez faire market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coordinated by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market failure. In contrast, it is the domination of the local state in Wuxi that ended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took the local-state-coordinated mixed-market econom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local state in Wuxi played only a weak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ial role, always followed in the steps of the central state, and lacked initiative to shape its own path of transition. As a result,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icolage and layering i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Wenzhou and Wuxi's economic transition.

Keywords: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y,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bricolage and layering

中國歷經三十多年的市場經濟轉型，不僅透過國際經濟分工、貿易、外商投資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緊密鑲嵌，並於 2010 年躍升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¹ 就在中國受惠於國際市場需求與外國直接投資之際，也承受國際經濟波動與產品競爭的衝擊。尤其中國於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外資企業與外國產品不斷進入中國，更加促使中國國內市場競爭白熱化。再加上 2008 年席捲全球的國際金融風暴、近期南歐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美國政府龐大財政赤字及緩慢的復甦腳步，不僅嚴重傷害中國外銷經濟部門，而且促使許多原本外銷為主的企業開始發展內銷，更加惡化中國國內市場與區域競爭。² 廠商間的競爭廝殺不僅展開優勝劣敗的淘汰機制，而且滲透地方經濟，迫使地方採取調適策略，回應國內外經濟衝擊。

中國在市場激烈競爭與全球經濟不景之際，有些地區面臨市場嚴峻挑戰而失去低價競爭優勢，有些尚能站穩腳跟維持既有水準而不下墜。顯然國內外的經濟波動促使中國國內不同地區在經濟階梯上呈現上下流動，重新洗牌。中國各地皆努力發展應對策略(coping strategies)，以經濟轉型來應變國內外市場競爭壓力與金融危機。例如浙江溫州早先以私營經濟聞名，雖然近年來溫州仍維持對浙江省 GDP 產值貢獻的第三順位（見圖一），但在國內外市場競爭壓力下出現經濟產值增長率下跌、資金外流、企業外遷、工業生產外包、產業逐漸空洞化等現象，不僅引發地方幹部的政績焦慮，而且採取應對策略回應市場的激烈競爭，本文認為溫州已從早期類似割喉競爭式的準自由市場經濟(semi-liberal market economy)，逐漸轉型為行業商會或協會協調為主的市場經濟(associational-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縱使如此，溫州仍難擺脫持續的產業外移與資金外流。相較之下，江蘇無錫

1 參見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 (2011/9/24)。

2 中外學者認為中國在 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國內省際與不同地區間的貿易障礙與地方保護主義已逐漸消除，形成國內市場的統一性(Ji 2004)。雖然許多學者持相反觀點 (Zhao et al. 2008; Li 2008; Poncet 2005; Lei and Liu 2005; 洪銀興 2005: 314-320)，但不可否認，中國境內的公營、民營、合資與外資企業為搶占市場而競爭激烈已成事實，尤其東部沿海省分的高度市場化、工商業化與都市化，不僅滲透影響省以下地級市的區域發展，並迫使各地區針對國內市場競爭做調適。

的鄉鎮集體企業雖自 1990 年代不敵私營與外資企業而進行產權私有化改革，而且經濟產值成長率自 2004 年以來逐漸下滑（見表一），但在地方政府領導下積極引進外資(FDI)，以外資取代本土企業的產值與稅收，使無錫維持對江蘇省 GDP 產值貢獻的第二順位（見表五）。此外，無錫市政府鼓勵發展企業集團，幫助它們進入股市取得資金，抗拒市場競爭壓力，並且更積極鼓勵科技產業發展、促進產業聚集、推動服務業成長、提升地方產業結構。本文認為無錫顯然已從過去鄉鎮集體企業所有者的地方政府公司法人(local state corporatism)，轉型為以地方政府協調為主的混合市場經濟(local state-coordinated mixed market economy)。如何解釋溫州與無錫採取不同的應對策略去調適國內外市場競爭壓力與國際金融危機？如何界定對抗市場競爭的調適策略與制度變遷特性？

本文從制度論出發，企圖解釋當溫州與無錫面對全國一致的中央政府政策與制度環境時，為何兩地在回應國內外市場競爭與金融危機上呈現調適策略選擇與經濟轉型路徑的差異？雖然中央政府政策與全國性制度環境在過去三十年持續調整，而且近二十年來中國政府採取國家領導的資本主義(state-led capitalism)體制(Huang 2008: 237)，可能對無錫的經濟發展比溫州友善，但本文將焦點鎖定在兩地地方制度的差異，尤其探索兩地的制度行動者，如地方政府、行業商會與企業廠商，如何透過不同的地方比較制度優勢與制度互補，去形塑不同的應對策略做經濟轉型以調適市場競爭。同時，建立在社會生產體系論述(social system of production)、資本主義多樣性架構(varieties of capitalism)與超越資本主義多樣性觀點(beyo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概念基礎上，本文強調在溫州與無錫的經濟轉型中，地方政府干預與協調經濟能力的強弱、地方行業商會的外向連結或封閉性、地方企業經營行為的依賴慣性或創新精神，都影響溫州與無錫不同的轉型路徑。本文進一步認為溫州行業商會所建構的包容開放與外向連結的社會網絡，以及強勢主導經濟發展的無錫地方政府，均扮演制度企業家角色

(Campbell 2004: 74-77; DiMaggio 1988: 14-15),³在結合不同的地方比較制度優勢與制度互補後，不僅共同推動地方制度變遷與選擇應對策略，而且複製與延續地方經濟轉型的制度分歧。

本文比較溫州與無錫三十年來因應市場競爭的經濟轉型差異。溫州自 1978 年中國經濟改革後走向民營企業發展道路，且被認定為私營經濟發展最具代表性的地區之一(Liu 1992)，而無錫地處江蘇省南部，與蘇州、常州並列為蘇南鄉鎮集體企業發展的代表。溫州與蘇南在經濟發展上的路徑走向與產權差異，一向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與媒體報導（中國新聞周刊 2006/5/19）中最具代表性與爭議的地區。由於溫州與無錫皆位於中國東部沿海省分，同屬行政級別上的地級市，⁴工商業與市場經濟發展較其他地區早，也較其他地區發達，易於觀察市場競爭對地方經濟造成的衝擊，也足以反映產權發展近似地區所做的調適策略選擇。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來自作者從 2004 到 2009 年寒暑假的田野調查。作者前後多次訪問溫州與無錫的私營中小企業、民營化之集體與國營企業、地方商會與協會、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幹部、地區性大學的學者等。此外，作者以文獻資料、地方政府出版品、統計年鑑、中外學者學術著作等來彌補田野調查之不足。文中涉及訪問的企業、政府與退休幹部、企業家、商會與協會負責人、學者等均為匿名，並以符號代稱，以保護受訪者。在討論溫州與無錫因應市場競爭挑戰而採行不同的應對策略之前，有必要先瞭解比較制度優勢、制度互補與制度企業家的意義。

3 John L. Campbell (2004)將推動制度變遷與創新的行動者視為制度企業家，可以是個人、企業與組織。若企業家居於網絡核心位置，易於接觸到眾多新理念並享有較多資源，有利於推動制度變遷。作者同時感謝審查人之一的提醒，最早提到制度企業家的學者是組織社會學大師 Paul DiMaggio。

4 中國地方行政體制中，地級市介於省與縣（縣級市）之間，由地級市管理下轄各縣、市，如無錫市管理下轄的江陰與宜興兩個縣級市。

一、理論觀點：比較制度優勢、 制度互補與制度企業家

近年探討有關經濟發展的文獻中，政治經濟學者認為一國的經濟成長無法完全被投入的資金、勞力、甚至技術所解釋，與生產相關的制度環境對國家經濟成長同樣重要。制度環境不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可以影響經濟成長率與技術進步(North 1990; Hall and Soskice 2001; Hollingsworth and Boyer 1997)。在此一理論基礎上，強調制度的比較政治經濟學文獻應運而生。例如社會生產體系(social system of production)觀點以企業為核心，強調企業的生產、交換、融資、雇傭等關係是緊密鑲嵌在地方制度網絡中，並接受市場、層級(hierarchy)、網絡、協會(associations)、國家等不同機制協調其經濟交易關係(Hollingsworth and Boyer 1997; Hollingsworth 2002)，而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架構強調國家層級的政治經濟制度會影響經濟行動者的策略互動，尤其著重各國不同的制度互補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比較制度優勢(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來解釋各國不同的企業行為、投資與發展模式(Hall and Soskice 2001)。其中制度互補指涉經濟體中，一個制度的效益會被另一個制度出現的效益所增強，例如過去德國企業所採用的長期雇用制度，正巧與不注重企業利潤率為前提的金融體制並存，德國銀行提供長期貸款照顧所扶持的企業，不會在經濟波動時抽取銀根，反而幫助企業繼續雇用原有員工，不致像美國企業在經濟不景氣時做大規模裁員，所以在照顧企業長期發展的金融制度互補下，德國企業得以維持長期雇用關係(Hall and Soskice 2001:17-18)。而比較制度優勢則指廠商所處的地方政治經濟制度環境，不僅支持廠商的生產活動，而且為生產提供經濟效益，透過制度支持使廠商的特殊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中具有競爭優勢(Hall and Soskice 2001: 37)。

探索比較政治經濟發展的學者，透過制度互補與比較制度優勢的

概念建構，發現各國經濟體呈現多樣性，分布在自由市場(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與協調市場(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CMEs)兩大理念型經濟體之間(Hall and Soskice 2001)。當東歐共產政權瓦解，全球經濟整合加速，各國均面臨國際市場挑戰與國內衝突壓力，強調政治經濟體靜態與功能的資本主義多樣性架構，遂被批評難以處理政治經濟體內的動態衝突與創新，因而超越資本主義多樣性觀點(beyo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興起，將權力、衝突、政治結盟、國家角色等納入政治經濟體制的分析研究中，並在已有的政治經濟體理念型中，加入混合市場(mixed market economies, MMEs)與新興市場(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EMEs)的經濟體架構，以回應全球經濟震盪的挑戰(Hancke et al. 2007)。

在東歐經濟轉型的制度變遷研究中，一些學者認為主導經濟轉型的行動者如同制度企業家，不僅從外向連結的社會網絡與組織場域中匯集各種資源、理念與資訊來做制度創新與策略選擇，並且從已被揚棄的共產政治經濟體系中挑選可用的制度元素予以重新組合，因此市場經濟轉型並非全新的建構設計，而是路徑依賴式的制度元素重新組合與手工修補(bricolage)⁵ (Campbell 2004: 69-74; Stark and Bruszt 1998)。本文則從溫州與無錫回應市場競爭的策略選擇比較中，體認到兩地經濟轉型的制度變遷，不僅具有舊制度元素重新組合的手工修補，而且新制度元素引進覆蓋在舊元素之上的層疊交替(layering)(Mahoney and Thelen 2010: 15-17)，⁶ 形構中國經濟轉型中制度變遷的特性。

本文承襲上述理論架構的制度論述，但轉移中央政府與全國性制度環境的理論關懷，而將分析焦點置於中國境內不同的區域經濟——溫州與無錫，並觀察地方制度行動者，如企業經營者、地方政府、地

5 Campbell (2004)在討論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特性時，強調制度企業家從舊有制度材料中撿取有用者，重新拼裝組合又予以手工修補，這種制度變遷稱之為 bricolage。

6 James Mahoney 與 Kathleen Thelen (2010)在討論制度變遷特性時，按政治脈絡、制度特性與變遷代理之間的互動關係，將制度變遷分為四種類型：取代(displacement)、層疊交替(layering)、隨波逐流(drift)與轉變(conversion)。本文認為溫州與無錫經濟轉型中的制度變遷最符合層疊交替(layering)。

方行業商會與協會之間的策略互動，來理解地方制度如何形塑行動者的應對策略選擇，以回應激烈的國內外市場競爭與金融危機。本文強調溫州地方制度的比較優勢在於私有產權與靈活的企業經營精神，相應的制度互補則是無為而治的地方政府，而制度企業家則由相對自主的地方各種行業商會、協會與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承擔，負責協調地方經濟秩序與制度創新。至於無錫的比較制度優勢在於相對豐富的集體資產，以及規模較大的國營和集體股份制企業集團，相應的制度互補是弱勢的民營企業與附屬於地方政府且輔助政策執行的地方行業協會，制度企業家則是一向強勢干預經濟的地方政府。

由於溫州向來資源貧瘠，欠缺集體積累，在計畫經濟時代就因財力困頓無法發展國營與集體企業，以致地方政府鮮少插手與干預農民的私營經濟活動，縱使在毛時代的政治運動中曾發揮政治壓制，但放任無為成為常態，導致溫州「走資派」的惡名遠播，也因此奠定日後私營企業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Liu 1992)。相較之下，無錫地方政府一向忠於社會主義的集體產權，在 1970 年代就積極利用集體資產發展農村社隊企業，⁷在此基礎上，無錫繼續於 1980 年代推動鄉鎮集體企業，而且不遺餘力鎮壓私營經濟，並以弱勢的私營經濟作為制度互補，凸顯集體企業的生產效益。在改革初期的短缺經濟年代，以生產民生用品為主的鄉鎮集體企業曾大放光彩。與溫州家庭作坊及中小企業相同，無錫鄉鎮集體企業的產品，不論品質如何低劣與技術如何原始，均能搶占國內市場，造就蘇南與無錫在 1980 年代的經濟奇蹟（彭安玉 2007）。

當短缺經濟不再，買方市場形成，溫州勞力密集、技術原始的中小私營企業，易於在中國各地複製，形成競爭對手。在地方政府無為放任之下，中小企業在溫州準自由市場的激烈競爭中，惡性削價相互廝殺，導致廠商利潤微薄，又因相互挖角技術工人，以致勞動力跳槽頻繁。廠商為降低生產成本，不斷偷工減料、製造偽劣產品，重挫溫

7 社隊企業指毛統治年代由公社與生產大隊所創辦的企業。

州商品信譽。此時地方政府應適時干預，制訂法規與加強監督，防止惡性競爭帶來的市場失靈，但地方政府卻袖手旁觀缺乏作為。在市場激烈競爭下，溫州許多行業商會與協會遂自發而生，取代地方政府，出面協調廠商間的惡性競爭，制訂生產法規、協調價格，解決同業面臨的困難，並提供同業相關的諮詢與法律服務，促使溫州邁向商會協調為主的市場經濟，防止市場失靈。同時中小企業在經濟危機中急需的融資貸款，也由中小企業促進協會與行業商會出面，在地方政府默許下，以民間小額擔保公司進行融資放款，進行類似銀行的金融業務。因此本文認為溫州行業商會與協會的包容開放與外向連結，承擔地方經濟轉型與制度變遷的制度企業家角色，在與地方政府、廠商的策略互動中，促使地方從過去的準自由市場經濟轉型為商會協調為主的市場經濟。

相較之下，無錫鄉鎮集體企業在市場白熱化競爭中，暴露類似國營企業的冗員充斥、生產疲憊與欠缺經營效益弊病，在虧損倒閉之際，鄉鎮企業被迫邁向產權私有化。但不同於溫州地方政府的消極作為，無錫地方政府強勢積極，全力主導地方經濟轉型，不僅產業協會與商會無用武之地，必須依附地方政府才能生存，造成它們弱勢無能。為提升地方經濟，無錫市政府創造企業發展所需的制度支持，包括企業集團的上市融資、企業利潤保證的市場寡占與壟斷、企業經營所需的政商關係、積極引進外資、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地理群聚等。不論經濟轉型成效如何，無錫地方政府始終以制度企業家身分推動地方經濟轉型，使無錫從過去企業所有者的公司法人轉變為地方政府協調為主的混合市場經濟。縱使無錫地方政府全力主導地方經濟發展，卻始終追隨中央政策之後，並以落實中央政策為己任，與溫州商會時而為之的大膽創新有所不同。

本文同意制度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文獻的觀點，制度演化與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的特性，而且制度變遷與演化未必改變原有核心的制度互補或比較制度優勢(Hancke et al. 2007: 11)。換言之，當溫州與無錫面對國內外市場激烈競爭做應對策略選擇時，舊有制度中的比較制

度優勢與制度互補會被制度企業家保留，但這並不表示它們會為地區的經濟轉型帶來正面結果。例如溫州靈活的企業經營在惡性競爭中導致市場失靈、企業出走與投機性的利潤賺取，而無錫比較制度優勢中的較大規模集體與國營企業集團，雖在私有化中與地方政府切割產權，但卻無法培養獨立經營精神，仍持續冀望政府給予優惠補助。溫州私營經濟發展的制度互補一無為而治的地方政府，雖不像無錫那樣打壓私營經濟，但面對惡性競爭與高利貸席捲的市場失靈卻束手無策，需要較為強勢的地方行業商會與協會以制度企業家姿態協助經濟治理與制度創新。相較之下，無錫雖有行業協會輔助地方政府做政策執行，並以弱勢的民營經濟陪襯大型國營與集體企業集團，而位居制度企業家的強勢政府，在主導地方經濟轉型之際，卻經常造成投資浪費，欠缺經濟效益。因此不論正負結果，地方制度企業家會在原有比較制度優勢與制度互補配合下，加入新的制度元素，持續形塑地方經濟轉型的策略選擇來應對市場競爭與金融危機。在解釋兩地的制度企業家、比較制度優勢、制度互補如何形塑不同的應對策略與轉型路徑之前，我們應先瞭解中國市場激烈競爭對區域經濟造成的衝擊。

二、溫州與無錫面對市場競爭的衝擊

溫州與無錫均為中國沿海省分最富裕地區，自 1980 年代初期就因善用地方資源稟賦與比較制度優勢，分別以農村私營經濟與鄉鎮集體企業，及早搶占國內民生用品市場，創造地方經濟奇蹟。表一呈現溫州與無錫近十年的經濟生產總值與成長率。

不論城鎮或農村，今日溫州與無錫人均收入均遠高於全中國平均所得（見表二），展現兩地在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的早發展優勢。但當中國國內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溫州與無錫的發展均受到嚴重衝擊。

（一）溫州經濟面臨的困境

溫州位於浙江省南部沿海，南接福建，西臨麗水與金華，人口共

表一 無錫與溫州經濟生產總值及成長率（2001-2010 年）

| 年／地區 | （單位：人民幣億元） | | | |
|------|------------|--------|-----------|--------|
| | 無錫 | | 溫州 | |
| | 生產總值(GDP) | 成長率(%) | 生產總值(GDP) | 成長率(%) |
| 2001 | 1,360 | 11.5 | 932.08 | 12.3 |
| 2002 | 1,601.7 | 13.1 | 1,055 | 13.0 |
| 2003 | 1,901.22 | 15.4 | 1,220.3 | 14.8 |
| 2004 | 2,350 | 17.4 | 1,402.57 | 14.1 |
| 2005 | 2,850 | 15.1 | 1,600.17 | 13.0 |
| 2006 | 3,300 | 15.3 | 1,834.38 | 13.3 |
| 2007 | 3,858 | 15.3 | 2,157 | 14.3 |
| 2008 | 4,419.5 | 12.4 | 2,424.29 | 8.5 |
| 2009 | 4,992 | 11.6 | 2,527.88 | 8.5 |
| 2010 | 5,758 | 13.1 | 2,925.57 | 11.1 |

資料來源：溫州市統計局(2001-2010)，〈溫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無錫市統計局(2001-2010)，〈無錫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表二 溫州、無錫城鎮與農村人均所得（2001-2010 年）

| 地區／年 | （單位：人民幣元） | | | | | | | | | |
|------|-----------|--------|--------|--------|--------|--------|--------|--------|--------|--------|
|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 溫州 | | | | | | | | | | |
| 城鎮 | 13,200 | 14,591 | 16,035 | 17,727 | 19,805 | 21,716 | 24,002 | 26,172 | 28,021 | 31,201 |
| 農村 | 4,683 | 5,091 | 5,548 | 6,202 | 6,845 | 7,543 | 8,519 | 9,469 | 10,100 | 11,416 |
| 無錫 | | | | | | | | | | |
| 城鎮 | 9,454 | 9,988 | 11,647 | 13,588 | 16,005 | 18,189 | 20,898 | 23,605 | 25,027 | 27,750 |
| 農村 | 5,524 | 5,860 | 6,329 | 7,230 | 8,004 | 8,880 | 10,026 | 11,280 | 12,403 | 14,002 |
| 全國 | | | | | | | | | | |
| 城鎮 | 6,860 | 7,720 | 8,472 | 9,442 | 10,493 | 11,759 | 13,786 | 15,781 | 17,175 | 19,109 |
| 農村 | 2,366 | 2,476 | 2,622 | 2,936 | 3,255 | 3,587 | 4,140 | 4,761 | 5,153 | 5,919 |

資料來源：溫州市統計局(2001-2010)，〈溫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無錫市統計局(2001-2010)，〈無錫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全國平均所得資料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2001-2010)，〈全國年度統計公報〉。

計 756 萬。溫州下轄 6 個縣、2 個縣級市、3 個市級區；2006 年城鎮人口占全市總人口 60.22%，高於浙江全省平均的 56.5%，都市化程度名列全省第四（課題組 2008: 2-5）。溫州早在 1980 年代初以私營經濟崛起，農村人均所得從 1978 年的 113 元（課題組 2008: 5）上升到

2010 年的 11,416 元，同年城鎮人均收入高達 31,210 元，名列浙江全省第一與全中國第四，僅次於東莞、深圳與上海（見表三），由此可見溫州民間財富積累的實力與充裕的游資。

溫州對浙江省 GDP 的成長貢獻一直位居全省第三，僅次於杭州與寧波（見圖一）。溫州各項經濟指標表現亮麗，但最近十年溫州幹部對地方經濟發展充滿隱憂與焦慮。第一，溫州 GDP 成長率雖自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急速下跌，但自 2010 年已有所回升（見表一與圖二），可是浙江省其他地級市 GDP 成長速度更快。溫州 GDP 的增長率自 2003 年以來在浙江省 11 個地級市中就已排名倒數第二或第三（朱康對 2008: 27）。圖一顯示溫州 GDP 成長率在 2010 年與舟山並列 (11.1%)，居全省倒數第二，只比紹興(11%)略高，但低於全省平均 (12.25%)。圖二是溫州市 GDP 從 1979 到 2010 年之間的增長變化。圖一與圖二均顯示溫州近年經濟發展遲滯，造成溫州幹部焦慮政績，擔心溫州經濟成長墊後，失去原有發展的經濟優勢與位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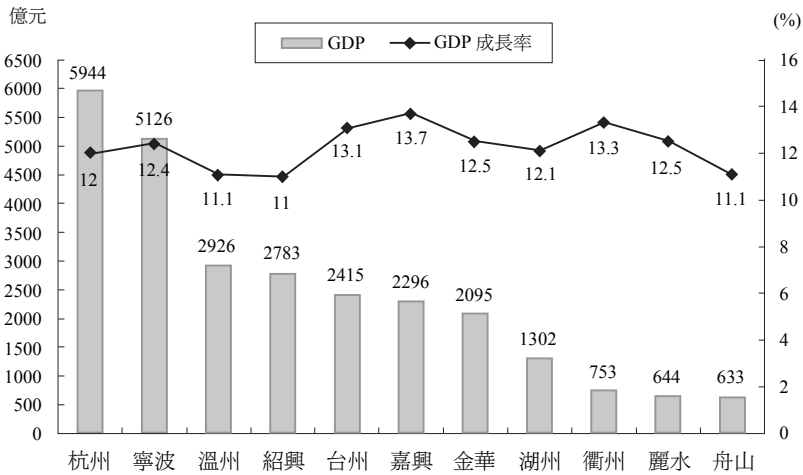
溫州幹部的第二個焦慮來源是資金外流與企業外移。在溫州經濟成長中，許多中小企業為擴充產能，迫切需要額外土地擴建工廠，但卻發現土地短缺與地價昂貴。例如溫州瑞安市工業區中一畝土地索價

表三 2010 年中國主要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排名

（單位：人民幣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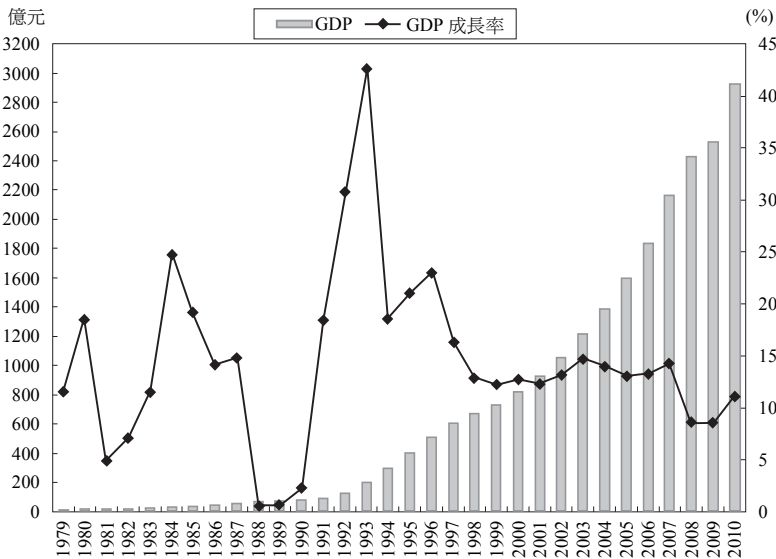
| 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 排名 | | | 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 排名 | | |
|--------------|--------|----|--------------|--------|----|
| 東莞 | 36,350 | 1 | 北京 | 29,073 | 11 |
| 深圳 | 32,381 | 2 | 南京 | 28,312 | 12 |
| 上海 | 31,838 | 3 | 無錫 | 27,750 | 13 |
| 溫州 | 31,210 | 4 | 嘉興 | 27,487 | 14 |
| 廣州 | 30,658 | 5 | 佛山 | 27,245 | 15 |
| 寧波 | 30,166 | 6 | 台州 | 27,212 | 16 |
| 紹興 | 30,164 | 7 | 常州 | 26,269 | 17 |
| 杭州 | 30,035 | 8 | 舟山 | 26,242 | 18 |
| 廈門 | 29,253 | 9 | 湖州 | 25,729 | 19 |
| 蘇州 | 29,219 | 10 | 珠海 | 25,382 | 20 |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2010)，〈[各城市]2010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圖一 2010 年浙江省 11 個地級市的 GDP 的增長變化

資料來源：金浩、王春光編(2008: 27)，《溫州藍皮書：2008 年溫州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浙江省各地級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見附錄）。



圖二 溫州市 GDP 增長變化，1979-2010 年

資料來源：金浩、王春光編(2008: 23)，《溫州藍皮書：2008 年溫州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溫州市統計局(2008-2010)，〈溫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1 到 30 萬人民幣之間，而在無錫一畝只要 10 到 20 萬元之間。⁸溫州許多中小企業均申請進入開發區，希望取得廉價工業用地擴張產能，但卻發現候補名單過長，而且中小企業每年繳納營業稅若少於 50 萬元者，將失去申請資格。⁹

由於溫州經濟富裕與物價較高，勞動成本逐年上升，削弱溫州本地企業在全國市場的競爭力。早在 1990 年代溫州本地企業大肆擴張之際，就被日漸上升的生產成本與土地能源不足所制約，導致許多本地企業於 1990 年代下半葉開始將生產線外移到工資較為低廉、環境較為友善、水電供應較充分的地區。同時溫州許多企業將生產訂單從溫州本地轉移到其他地區，尋找工資廉價的外包工廠。顯然，資金外流與生產外移削弱溫州 GDP 的增長率，這使溫州幹部神經緊張，擔心溫州在浙江的經濟地位不保，會被其他城市取代。但業界卻有不同的看法，認為溫州幹部若擔心溫州企業在浙江與全國的競爭力，就應該想辦法替企業解決困難與提供援助以挽留企業。一位將成衣工廠遷到浙北湖州生產的溫州企業家談到：

我曾在溫州市住宅區內擁有三層樓的工廠大廈，一樓是車間，二樓是倉庫，三樓是工人宿舍。因為工廠無法通過溫州市政府衛生單位每年的安全檢查，我被政府要求遷出溫州市住宅區。當時我無法在溫州市找到其他合適地點重建工廠，因為美國 Wal-Mart 與 JC Penny 已下訂單給我，我必須立刻擴充產能。溫州市政府對我沒有提供任何幫助，正在我面臨發展困頓之際，湖州正在招商，我就將工廠遷到湖州 Z 鎮工業區，本地工資與土地都很廉價，適合我做擴大生產。Z 鎮政府對我非常禮遇，經常噓寒問暖，提供幫助。我若有所需要，就直接去鎮政府要求協助，去鎮政府如同去鄰居家一樣

8 作者於 2004 與 2005 年先後訪問瑞安市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管委會）幹部與無錫新區管委會，兩園區均提供廉價工業用地，但價格差異很大。

9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所一位學者提供的資訊。

方便。但在溫州沒有任何幹部會理我，更不會主動提供幫助。¹⁰

另一位溫州企業家也認為溫州市政府能力低落，無法整頓溫州經濟秩序，以致溫州產品惡名昭彰，遂將生產移到上海：

我在 1993 年開始生產做產品包裝的機器工具，包括封罐機與包裝機。那時溫州工業產品不僅質品多，而且品質差不牢靠，消費者對溫州產品沒信心。因此我將生產線遷到上海，因上海工業產品聲譽好，品質佳且可靠。我在上海不僅為你們台商做代工，還銷售到德國去，這是在上海生產的好處。我遷到上海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溫州的地價成本高於上海，而且上海地區的政府不像溫州地方政府那樣向我們伸手要錢。¹¹

上述訪談不僅表現溫州典型的準自由市場競爭，資金與工廠均自由外移，而且反應溫州地方政府的勒索慣性。首先，溫州企業外移，除降低生產成本考量外，就是要避免地方政府官僚體系的騷擾索賄。由於溫州地方政府財政一向困窘(Liu 2012)，為增加地方預算外收入，不時以各種名目、攤派、規費，要求企業出資捐款，贊助地方政府舉辦的各種活動與建設，許多中小企業不勝其擾。然而當企業產能擴張需要政府幫助之際，地方政府卻反應冷淡，愛莫能助，這與中小企業在外地投資受到當地政府禮遇與熱心協助截然不同。在地方推力與外地拉力推動下，溫州自然產生資金外流與企業外移。

其次，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惡劣投資環境下，溫州企業家出走全國各地尋找合適的投資機會，近者如到鄰近縣市的麗水、義烏、

10 作者於 2006 年訪問投資浙江湖州 Z 鎮的溫州企業家。

11 作者於 2008 年訪問溫州 S 公司董事長。

金華等地或浙北投資，或到鄰省福建建立工業園區與商場（如福鼎與寧德等地），¹² 遠者則赴黃河以北與中西部偏遠山區去投資。¹³ 自國際金融風暴席捲全球以來，溫州私營中小企業在缺乏融資與訂單衝擊下，將近 20% 關門歇業，其中約 80% 的服裝廠與 50% 的打火機廠停工。¹⁴ 在投資環境惡化與市場競爭力不足之際，溫州許多企業挪用技術改造與升級的銀行貸款，轉做投機性的房地產投資。根據調查，2010 年溫州市前百大企業中，超過一半以上的著名製造廠商涉入投機性的房地產開發與土地買賣，少有將銀行貸款融資用於企業的技術發展，而更多企業到外省去投資。¹⁵ 不僅如此，溫州絕大多數家庭均捲入房地產投資，以致溫州「炒房團」聞名全中國。資金外流他省已成為溫州地區的敏感話題，自 2005 年之後就很難找到資金外流的官方統計。表四是溫州 2002 到 2005 年資金外流他省與外地的數據。

表四 溫州外流他省與外地的資金總額（2002-2005 年）

| （單位：人民幣億元） | |
|------------|--------|
| 年 | 金額 |
| 2002 | 超過 100 |
| 2003 | 270 |
| 2004 | 380 |
| 2005 | 200 |
| 總計 | 950 |

資料來源：溫州年鑑(2003, 2004, 2005, 2007)。

第三，溫州家庭作坊與中小企業為及早搶占地方與國內市場，產品粗製濫造，各種仿冒品充斥全國，反映出誰先生產，誰就搶先獲得商機。在地方準自由市場惡性競爭下，地方政府干預無效，並在地方利益驅使下，任由溫州生產贗品，惡名遠播，往往在中央政府出面干預下，溫州市政府才有所作為。例如 1980 年代樂清縣柳市鎮家庭作

12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大學城市學院與市委黨校教授。

13 作者 2008 年在湖北西部山區的建始縣做田野調查，訪問在當地投資的溫州企業家。

14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

15 見經濟觀察報(2011)溫州面臨「產業空心化」。

坊以生產低壓電器開關聞名，但因產品粗製濫造，引發多起電線走火，造成災難，因而中央機械部下達公文，譴責柳市鎮電器產品的惡質，溫州市政府才跟進做整頓(Liu 1992)。又如溫州製鞋工廠生產的粗劣假鞋於 1987 年被杭州市政府大規模銷毀後，溫州市政府只得動員成立鞋業協會，進行品質管制與制止同業惡性競爭（張弘遠 2006；葉培紅、張錦春 2002: 76）。¹⁶ 縱使後來溫州各種輕工業產品品質有所改善，但 1990 年代以來溫州惡質產品仍不斷被揭發，包括假藥、假嬰兒奶粉、缺乏安全性的打火機等，顯示地方政府經濟治理能力不足，不願主動干預與管理經濟事務，放任溫州中小企業在缺乏規範的準自由市場中彼此惡性競爭。

第四，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席捲全球之際，中國政府因應國際市場訂單減少，為解救本國外銷為主的企業，防止大批工廠倒閉與失業率上升，遂投入四兆多人民幣，創造國內市場消費需求，以內需替代出口來維持國內經濟成長。¹⁷ 然而短期間大量貨幣投入市場，造成物價飛漲。中央政府遂在 2010 年為壓制嚴重的通貨膨脹，採取銀行緊縮銀根策略，導致中小企業更難從銀行得到貸款，在資金周轉困難下，原已發達的溫州地下金融更形猖獗，高利貸橫行。溫州全民，包括地方官員，各式各樣的互助標會到地下錢莊，甚至政府單位的「小金庫」與現款充裕的國營企業，一齊捲入地下金融的高利放款，尋求暴利（中國時報 2011/9/27），利率甚至高達 60% (Time 2011/11/28)。在利息無以為繼之下，於 2011 年秋季便出現溫州企業老闆為躲避暴力討債而失蹤，甚至傳出自殺消息。當消息登上媒體成為全國性新聞，甚至傳播國外，溫州幹部更加焦慮。目前，中央政府雖已指示地方銀行放寬貸款限制，改善溫州私營企業的資金周轉困難，但地方金融市場的嚴重失靈將會持續困擾溫州經濟，徒增溫州官員的神經焦慮。

溫州私有產權與靈活經營手腕的比較制度優勢，較集體和國營企

16 最早成立於 1988 年的溫州鹿城鞋業協會，後來加入 1991 年成立的溫州市鞋革工業協會（葉培紅、張錦春 2002: 77）。

17 作者 2009 年訪問無錫市政府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的退休官員。

業更早嗅得商機，並在溫州各級政府無爲默許的制度互補下，使私營中小企業在全國市場競爭中捷足先登。但因缺乏政府有效管制與干預，無力建構地方完整的金融制度、幫助解決私營企業資金周轉的困難，致使溫州在全球金融危機、市場競爭與銀根緊縮壓力下，不僅呈現經濟成長停滯、資金外流與企業外移，也造成地方金融市場捲入政府無法控制的高利貸風暴中。溫州要如何選擇應對策略來因應市場競爭、資金外流與銀根緊縮的挑戰？

（二）無錫經濟面臨的市場挑戰

無錫位於江蘇省南端，南鄰太湖，北濱長江，東距上海 128 公里，西距南京 183 公里，與蘇州、常州同爲蘇南經濟發達地區，以「蘇南模式」著稱。無錫輕工業於十九世紀末奠定基礎，以繅絲、紡織、麵粉食品等工業出名（嚴克勤、湯可可等 2003: 19；吳柏均 1995），是蘇南地區農業、工業與文化重心之一。自共產政權建立，無錫本身因工業基礎強大，又地近上海，獲得中央政府重視，得到政府重大投資，建立不少大中型國營企業，導致無錫受制於計畫經濟，必須緊迫中央政策。與溫州的輕工業發展不同，無錫今日是全中國第七大工業城，重工業產值是輕工業的兩倍（黃勝平、湯可可 2005: 15）。無錫 GDP 產出在江蘇省僅次於蘇州，高於首都南京（見表五）。

與溫州鄉鎮的資源貧困不同，無錫農村的比較制度優勢在於豐富的集體資產，無錫地方政府利用此一集體積累，於 1970 年代發展社隊企業，並在 1980 年代繼續推動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因而造就蘇南經濟奇蹟。無錫鄉鎮政府一向強勢干預地方經濟，將管轄境域內所有鄉鎮企業組織成農工商總公司，以鄉鎮書記出任公司董事長，鄉鎮長出任總經理，政府與企業重疊，形構成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司法人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Oi 1992, 1999)。與過去計畫經濟的公社體制相同，地方政府公司法人是政治與經濟合一，政府既是經濟生產者，又同時是管理協調者；但與公社體制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公司法人是政

表五 2010 年江蘇省各地級市對省 GDP 貢獻的排名順序

（單位：人民幣億元）

| | 江蘇省各地級市的 GDP | 對江蘇省 GDP 貢獻排名 |
|-----|--------------|---------------|
| 蘇州 | 9,168.91 | 1 |
| 無錫 | 5,758.00 | 2 |
| 南京 | 5,010.36 | 3 |
| 南通 | 3,417.88 | 4 |
| 常州 | 2,976.68 | 5 |
| 徐州 | 2,866.93 | 6 |
| 鹽城 | 2,266.26 | 7 |
| 揚州 | 2,207.99 | 8 |
| 泰州 | 2,002.58 | 9 |
| 鎮江 | 1,956.64 | 10 |
| 淮安 | 1,345.07 | 11 |
| 連雲港 | 1,150.81 | 12 |
| 宿遷 | 1,015.21 | 13 |

資料來源：江蘇省各地級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見附錄）。

府與市場共同協調資源分配與經濟活動，雖然地方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遠大於市場機制。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無錫鄉鎮企業已不敵私營與外資企業的經濟效益。尤其鄉鎮企業所有權屬於鄉鎮政府，與國營企業類似，承擔許多政治與社會任務，並非單純的追求經濟利潤。若企業經營不善而虧損，往往不是經營幹部的責任，因為外加的政治與社會任務，使鄉鎮企業在經營中無法以成本效益來衡量企業的經濟表現。一旦企業財務出現赤字，鄉鎮政府有責任為企業尋找救急資金，不僅造成地方銀行與信用社的呆帳虧損，也造成鄉鎮政府債臺高築。更由於鄉鎮企業投資不足，技術設備老舊，產品品質無法改善，導致市場競爭力不足。更有甚者，由於鄉鎮企業產權不夠明確，經營者易於從中造假，暗中侵吞企業資產。無錫與蘇南鄉鎮企業相同，在市場競爭中走投無路，被迫邁向產權私有化（劉雅靈 2001）。

無錫地方政府強勢主導經濟發展，更於 1990 年代在城鎮地區追

求外延式成長策略(extensive growth)，以資源投入拉動經濟成長。根據大陸學者的說法，這是一種「高投入、高耗能、重污染、低產出、難持續」的傳統粗放式經濟發展策略，依靠高度投入與大量資源消耗來維持經濟快速成長，但投入產出的經濟效益很低，並犧牲大量耕地與生態環境（洪銀興 2007: 9；申俊喜、蔣伏心 2007: 134；陳耀興 2007: 364）。大陸學者更進一步指出，無錫市在 1992 年每增加 1 元的 GDP 產出，需要固定資產投入 1.09 元，到 1996 年增加為 2.30 元，到 2003 年為 2.78 元，反映投入產出效益的降低（黃勝平、湯可可 2005: 20）。此外，無錫在經濟成長中承受高度廢水、廢氣與廢物的污染。有鑑於此，無錫市政府近年改變產業結構，著重投資效益，提高投入產出水準，減少污染，降低盲目的產能擴張，提倡所謂密集式成長(intensive growth)。

從統計數字觀察，無錫的工業發展實力明顯高於溫州，不僅 GDP 產值一向領先於溫州（見表一），城鄉收入差距也較溫州低，2005 年無錫與溫州的城鄉收入差距比為 0.32 與 2.89（范從來、孫覃明 2007: 123），但無錫城鎮人均收入始終落後於溫州（見表二），與溫州城鎮人均收入排名全國第四相比，無錫則排名全國十三（見表三）。為何無錫經濟發展的果實無法像溫州那樣多被城鎮居民所分享？無錫的比較制度優勢在於豐富的地方資源與集體資產，在強勢地方政府干預下，不僅以地方市場的寡占與壟斷保障集體與國營企業的利潤，而且壓制私營經濟發展，土地增值的暴利又完全被地方政府壟斷，導致地方政府財稅實力遠超過民間的富裕。¹⁸而溫州民營經濟的利潤多半落入私人口袋，地方政府又無力汲取課稅，以致溫州民間經濟實力較政府雄厚。無錫面對國內外市場競爭的夾擊，如何維持原有經濟地位、化解危機與追趕溫州民間的富裕？

18 作者於 2007 與 2009 年訪問多位無錫民營企業、學者、企業集團幹部等，都表達了類似看法。

三、溫州與無錫的應對策略：制度互補、比較制度優勢與制度企業家

溫州家庭企業在 1980 年代地方準自由市場經濟中的惡性競爭，已敗壞溫州商品聲譽，同時無錫地方政府公司法人推動的鄉鎮企業與國營經濟也喪失競爭優勢，在無錫採取產權私有化與積極引進外資作為調適策略應對市場挑戰之際，已處於私有產權環境中的溫州家庭企業如何應對市場競爭與恢復溫州商品名聲，並建立消費者信心？本文強調在溫州與無錫原有的地方比較制度優勢與制度互補下，溫州以行業商會的開放包容與外向連結，無錫以地方政府的強力經濟干預，分別扮演推動制度變遷的企業家角色，形塑地方策略選擇來回應市場競爭壓力，以致溫州與無錫走向不同的市場經濟轉型路徑。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制度企業家的策略選擇範圍已被原有地方制度所局限，不僅從既有制度中挑選可用的元素與成分，重新組合並做手工修補，而且引進新制度元素，強加於舊元素之上，形成新舊制度混合的層疊交替。

（一）溫州應對策略：從準自由市場到商會協調的市場經濟

與無錫採行產權私有化和積極引進外資不同，溫州雖處於私有產權環境，但地理位置遠離上海與長江三角洲，不利溫州吸引外資。溫州地方政府又無為而治，欠缺經濟干預的積極性，因此溫州只能從企業本身做起，不僅做技術、行銷與通路的升級，而且組織商會與行業協會做自我管理與監控，降低同業之間的惡性競爭，確保產品品質，防止市場失靈。

1. 溫州私營企業的獨立經營精神：地方比較制度優勢

溫州私營經濟起源於農村家庭作坊的小商品生產，依靠傳統制度中的親戚、血緣與鄰里關係作為互助信任的基礎，建立起分工合作的生產網絡，不僅降低生產與交易成本，而且以低價競爭取勝，形塑溫

州在 1980 年代的準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然而溫州低技術層次與勞力密集的小商品生產極易在全國各地複製，造成血淋淋的割喉競爭。例如成衣業者為爭奪外商訂單，彼此惡性削價、挖角技術工人，造成市場價格混亂、企業流血生產，無法賺到利潤。¹⁹

然而經歷三十年市場經濟轉型，許多溫州家庭作坊已開始蛻變，從結構扁平的小工廠轉變為生產垂直整合與多部門的大型公司，或跨產業生產的集團公司。例如今日溫州最大的正泰企業集團，最早從樂清縣柳市鎮製造低壓電器開關的小工廠起家，²⁰ 在發展過程中透過投資持股，將其他家庭作坊與小工廠併入成為企業集團的子公司，之後又陸續併入許多外包公司，並在全國各地城鎮建立獨立的行銷網絡，今日正泰集團仍在擴張之中（史晉川等 2002: 129-152）。

不同於無錫，溫州多數企業家保持低姿態，不願財富露白，縱使這些企業家的投資與生產已經遍布各個不同產業領域，他們也不願將多元投資事業正式組織為企業集團。溫州企業家對組織集團公司上市，從股市中取得企業發展資金頗為猶疑。一方面，許多溫州大企業自認不需要從股票證券市場募集資金，它們通常資金雄厚，使用自我積累利潤做再投資，或企業之間彼此相互拆借互為引援。另一方面，它們對公開財務報表取得上市資格頗有疑慮，擔心財務公開會引發地方政府覬覦，對企業發展未必具有正面效益。²¹ 溫州地方政府也消極被動，不會主動提供幫助、鼓勵企業進入股市，唯有在最近國際金融風暴衝擊過後，才轉變消極態度積極幫助企業上市。²² 相較之下，無錫的企業集團反倒競相爭取政府的幫助，從股市取得發展資金。

雖然溫州中小企業的技術層級低落，容易在他處複製而成為競爭對手，但在全國市場競爭壓力下，溫州一些企業逐漸結束勞力密集生

19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市服裝商會。

20 作者早在 1987 年蒐集博士論文資料期間，曾訪問過正泰集團前身，位於樂清縣柳市鎮的求精開關廠。

21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大型私營企業 S 公司等。

22 根據中國經濟網轉載中國證券網消息(2011/11/8)，溫州市政府在高利貸風暴後，開始鼓勵與協助溫州私營企業上市，取得股市資金。

產，走向科技成分較高的產業。根據一位生產 IC 智能（慧）卡的溫州老闆：

我過去是經營成衣廠的，但當我在 1990 年代末考察義大利米蘭的成衣工業之後，就把自己的成衣廠關閉，因為在服裝設計與製造上，我發現雙方差距過大，無法追趕。我從 2000 年開始轉向 IC 晶片設計、IC 智能（慧）卡生產與印刷事業，例如我生產信用卡、身分證、門禁卡等。我生產 IC 智能（慧）卡所需的塑膠片，過去都是從台灣進口，現在這些台灣廠商都到大陸設廠，一直是我的供應商。台灣在智能（慧）卡生產上技術進步，品質也很好，我有許多地方是向台灣廠商學習的。由於我目前經營的產品科技成分高，得到溫州市政府的幫助，進入工業園區，獲得廉價土地建立自己的工廠。²³

此外，溫州傳統產業的打火機裝配，為因應國內外嚴峻的市場挑戰，也開始做技術升級，根據溫州 D 打火機公司的董事長行政助理：

我們公司生產的打火機，約有 60%到 70%是出口，其中包括為 Marlboro 香煙的打火機做代工。打火機其實沒有太多技術含量，只是裝配而已。但因應業界的競爭，我們從 2005 年開始做研發，開發在高原空氣稀薄地區使用的打火機，由於研發成功，我們於 2007 年出口南美洲的高原國家，如墨西哥與哥倫比亞等國。目前全球經濟不景氣，我們的應對策略是生產 20%的高價位精品打火機，這是賺錢用的，其餘 80%是中低價位的打火機，這是不賺錢的，但可發工資給工人吃飯。²⁴

23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工業區的 W 科技集團副總裁。

24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 D 打火機公司董事長行政助理。

另外，位於瑞安市的H集團公司，旗下一家子公司已完成汽車引擎噴油系統零件的研發，根據該集團公司總經理：

我們剛完成汽車引擎噴油系統零件的研發，這是電腦控制的電子零件，與過去我們生產的機械零件不同。目前我們已經在汽車維修市場中銷售，正等待與汽車裝配廠簽約，希望能成為它們的零件供應商。此一零件過去完全靠進口，但現在我們已完成進口替代。我們還要進一步研發出適應高原、高熱地區的引擎噴油系統，提高產品的穩定性。²⁵

除技術研發與新產品開發因應市場競爭外，許多溫州企業家為分散市場風險，開始做不同產業領域的多元化投資，根據前述生產包裝機器的溫州企業家：

我除生產包裝機器外，並於 2003 年成立房地產開發公司，而且陸續投資網路科技公司與旅遊事業。我又於 2006 年以溫州第一個民間資本在上海成立創投公司，目前我已與嘉興地方政府合作，投資於嘉興政府推薦在當地科學園區經營優良的科技公司，有政府推薦與保證的公司應是安全的，我們公司總共投資兩億元的基金在嘉興科技園區。²⁶

此外，溫州企業家也積極做產品通路的開發，一位做辦公室家具的溫州老闆已開始建立電子商務的行銷部門，擴大他的產品銷售。除開設店面展示商品，如影印機、印表機、碎紙機、辦公室桌椅、文具等外，並建立網上購物站，專注於產品行銷。為降低成本，這位溫州老闆甚至關閉自己的工廠，不僅將生產外包，而且向外採購所需商

25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瑞安市 H 集團公司總經理。

26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 S 創投公司董事長。

品。²⁷ 溫州企業家們應變市場需求的速度很快，相互模仿學習，行銷手腕不輸外國企業。

溫州生產童裝的一位民營企業老闆，採取類似西方名牌成衣業的銷售方式，建立全國連鎖店的行銷管道出售童裝產品。這家童裝公司將生產全部外包，由總公司提供設計樣式，在溫州以外地區的成衣工廠代工生產，並由總公司負責品牌形象、廣告、行銷、採購、品質管理與資金周轉，目前這位老闆在全國已有 300 多家連鎖店做行銷。²⁸ 此外，溫州許多知名品牌的服裝業也走相同路線，利用外地廉價勞力做服裝代工，公司本身只做產品生產鏈中高附加價值的部分。²⁹ 溫州知名品牌的製鞋業也採取全國連鎖店加盟的方式，作為行銷手段。³⁰

溫州雖以勞力密集的中小企業起步，但面臨市場巨大競爭壓力，溫州企業家以靈敏嗅覺與經商頭腦，不斷向外學習新知，或做產品技術升級，或開發電子商務以擴張市場銷售。為降低生產成本，溫州許多企業家關閉生產線，向外地廠商採購或建立代工關係，作為應對市場競爭的策略。雖然在地方政府無所作為的制度互補下，多數溫州中小企業選擇生產外移與資金外流，造成媒體危言聳聽的「溫州產業空洞化」報導。畢竟選擇做科技研發與技術升級的溫州企業為數不多，而且溫州中小企業在浙江省科技進步水平排名倒數第二（課題組 2008: 10）。縱使如此，與無錫企業集團事事要求政府協助的依賴心態相比，溫州企業家不等政府提倡，並走在後知後覺的政府前面，積極開拓與爭取市場，搶奪先機。這種以企業獨立經營精神為基礎的地方比較制度優勢，形構溫州中小企業在全國市場中的競爭力。與無錫依靠外資企業支撐地方稅收與 GDP 產值不同，溫州經濟體主要依靠地方中小企業與集團公司的支撐。

27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 Ren 企業董事長。

28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 Y 童裝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

29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服裝商會秘書長。

30 作者 2004 年訪問溫州永嘉製鞋業的 H 集團公司。

2. 溫州行業商會與協會的外向包容與連結：創新的制度企業家

面對無所作爲的地方政府，溫州各產業在準自由市場的割喉競爭中，均認同成立行業商會與協會的迫切需要，以重整市場秩序與恢復溫州商品聲譽。在 1990 年代初期，溫州民間各行業商會與協會在自發基礎上陸續成立，³¹而中央政府直到 1997 年才頒布鼓勵辦法。溫州各商會與協會，爲禁止各行業內的流血惡性競爭，訂定生產標準程序、決定價格、協調業界糾紛與衝突，禁止與打擊偽劣贗品，幫助解決同業間的困難，增強同業間的自律行爲等（郁建興等 2006: 91），成爲建構創新的制度企業家。

與無錫類似，溫州頗有些行業協會早期由官方成立，但目前多已轉變爲民間法人團體的協會，如溫州印刷協會。根據印刷協會秘書長：

溫州印刷協會過去由政府二輕局成立，不是民間新興商會，但目前溫州印刷協會已是民間團體，與政府脫勾，專門為印刷業者服務。我過去任職於二輕局，退休後才應聘到印刷協會服務，成為秘書長。我們印刷協會的經費來自會員繳納的會費，並沒有任何政府經費挹注，因此印刷協會是真正的民間團體。目前全溫州市有 2,734 家與印刷相關的企業，絕大多數集中在蒼南縣，約 1,000 多家。我們溫州市印刷協會會員共有 280 家，這些都是規模較大的印刷企業、集團公司或團體會員，如溫州市下轄各縣的印刷協會分會，就是以團體會員資格，加入我們市區的印刷協會。我們的會員絕大多數是私營業者，在近年金融危機與市場競爭壓力下，約有 10%

31 作者在此未將行業商會與協會作細緻區分，因中國政府自 1990 年代末鼓勵商會與協會都回歸民間組織。但各地做法差異很大，例如無錫許多行業協會，過去由政府發起，隸屬經濟貿易委員會管轄，至今不願完全放棄管轄權，仍由幹部兼任協會職務。而商會多是新興行業的自發組織，伴隨私營經濟而發展，歸屬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工商聯）管轄。兩會性質的差異，見郁建興等(2006: 20-26)、張弘遠(2006)、浦文昌(2006)、保育均(2006)等的討論。

的業者停產與關門。許多業者為生存考量，集體遷到上海閘口區，落戶當地。我鼓勵他們要加入當地協會，以便適應當地環境而生存。我個人也和上海閘口區的印刷協會聯繫，服務我們外遷的溫州廠商。³²

但不論是否為民間自發性組織，溫州商會與協會都吸收同業個別廠商與團體會員，並與外移的溫州廠商及異地商會保持聯繫。³³溫州商會與協會也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幫助地方政府宣揚政策，並執行政府委託交辦的事務。例如幫助地方政府動員資金、鼓勵廠商捐獻、為偏遠貧困地區建學校，甚至到西部地區做投資、促進當地經濟成長，降低區域之間發展的失衡。³⁴

除同業協會與商會外，溫州還成立跨行業的中小企業發展促進協會，幫助解決溫州中小企業的困難。根據促進會會長：

中小企業最大困難是融資，缺乏貸款的抵押與擔保，因為中小企業沒有土地與廠房，土地與廠房都是租的，無法成為銀行貸款的抵押品，於是我們發起成立擔保公司，為中小企業借款做擔保。我們協會邀請各銀行負責人與政府官員加入為會員，壯大小額擔保公司的信譽。在我們帶頭下，目前溫州已經成立 270 多家小額擔保公司。目前全球經濟不景氣，中小企業首當其衝，許多擔保公司想要增加融資貸款業務，因民間利率最高可以是一般銀行的四倍。可是擔保公司不是銀行，禁止做銀行業務。而我們促進會就為擔保公司說項，將當前中小企業的困境向政府說明，因此溫州市政府已經應允小額擔保公司在 2008 年秋季轉型為社區銀行，為中小企業

32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市印刷協會。

33 溫州外移他地生產的中小企業，又在當地成立溫州同業之間的商會或協會，稱之為異地商會。

34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服裝商會與中小企業發展促進協會。

進行融資，並受法律保護。³⁵

在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說項之下，溫州小額擔保公司自 2008 年開始為中小企業進行融資貸款，這使溫州民間「地下錢莊」浮上檯面，進行合法的金融交易。在中國銀行融資貸款的金融業務仍受政府嚴格控制之際，溫州小額貸款公司的出現，是金融業務邁向民營化的一大創舉。³⁶ 不論這些民間小額擔保、貸款公司或社區銀行是否靠掛在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或一般商會、協會之下，它們都是獨立經營，在業務上與促進會或商會、協會無關。然而一旦中央政府勒令全國緊縮銀根，就引發溫州資金市場的貸款需求暴增，利率因而攀升為高利貸，賺取暴利動機遂席捲手中握有游資的溫州小額擔保與貸款公司、家戶與政府官員（中國時報 2011/10/6）。

當溫州中小企業在市場競爭中逐漸失去優勢，而全國各地不斷向溫州企業招商之際，溫州資金外流與企業外移已成為無法阻擋之趨勢。溫州各行業協會、商會、促進會遂組織溫州中小企業到外地考察，³⁷ 又幫助各地方政府到溫州招商，甚至與國際組織及社團交流，促進溫州中小企業的國際化，幫助尋找外資合作機會（周德文 2007）。

此外，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積極擴張會員，不僅拉攏各行業的個人與法人入會，也邀請相關銀行行長（包括中國交通與商業銀行、溫州銀監局副局長等）、政府相關部門官員、溫州異地商會、全國各地中小企業協會、各地區的地方政府官員、媒體、研究機構等入會成為副會長、顧問或會員，擴大促進會的網絡連結，吸收許多新的理念與資訊。由此可見，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甚至個別行業商會與

35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協會會長。

36 溫州民間早在 1980 年代就出現地下錢莊，為農村家庭作坊與中小企業進行融資。因未獲得政府正式允許，通常被視為非法營業。但基於民營經濟資金周轉的迫切需要，地方政府通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作者曾在 1987 年訪問溫州蒼南縣農村地下錢莊老闆。

37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中小企業在促進會組織下到山東鄆城縣、濟南市、陝西榆林市、通州市、滄州市、上海松江、遼寧朝陽、浙江衢州、貴州等地考察投資機會。

協會都不是自我封閉的地區組織，不僅包容性廣闊、向外連結，而且這些民間組織掌握更多資訊、資源與新理念，能提供會員更多協助，增加會員對外建立關係。

溫州許多行業商會與協會均提供類似中小企業促進會的服務，例如在 1994 年成立的溫州服裝商會，³⁸ 幫助本地成衣工廠尋找外地投資機會，更與外地政府（湖北省）合建工業園區，不僅將溫州成衣業廠商遷移過去，而且組織成衣業的協力廠，包括鈕釦、拉鍊、包裝、印刷、布料等廠商也一起遷移，在外地複製溫州成衣業的生產鏈。溫州服裝商會更爲當地園區的服裝業者開闢物流與銷售通路，爭取溫州廠商進入當地市場。商會或者要求當地政府建立服裝商場，或者商會自建，解決溫州業者的服裝行銷。³⁹ 溫州市政府當然不願見到資金外流與工廠外移的產業空洞化惡果，因此在溫州服裝商會建議下，溫州市政府與下轄平陽縣政府合作在當地建立工業區，利於溫州服裝業者遷到當地，擴大生產以便外銷（郁建興等 2006: 147；浦文昌 2006）。

溫州行業協會還提供法律服務，幫助業者進行國內外法律訴訟。當溫州打火機在 1990 年代外銷歐盟國家，卻被歐盟認定有傾銷嫌疑且缺乏安全性。根據歐盟規定，價格低於兩歐圓的廉價打火機，內部必須有安全裝置以保護孩童，因此禁止溫州生產的廉價打火機進入歐盟市場。面對國際貿易的法律糾紛，溫州市政府手足無措。此時溫州煙具協會出面，聯合廠商僱用律師與歐盟進行訴訟，辯護溫州生產的金屬外殼打火機並非一次性打火機，也非低於成本傾銷，最終贏得官司，解決歐盟反傾銷訴訟（郁建興等 2006: 142-144；浦文昌 2006）。此外，溫州鞋革工業協會制訂生產各種鞋類的標準程序，確保製鞋業者均遵守規定，並嚴格打擊假冒品牌，維護溫州製鞋業的聲譽（張弘遠 2006；葉培紅、張錦春 2002）。

溫州各行業商會與協會協助弱勢的地方政府，執行地方經濟治理

38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服裝商會時，溫州服裝業計有 3,000 多家，服裝商會約有 1,200 家會員企業，以及 6 個團體會員，經費來自各廠商會員所繳交的會費。

39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服裝商會秘書長。

與協調市場活動，防止市場失靈的惡性競爭，促使溫州從割喉競爭的準自由市場經濟轉向商會協調為主的市場經濟，因應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壓力。但這並不表示溫州商會與協會力量大到可與地方政府抗衡，或地方政府無法控制行業協會與商會。相反的，溫州商會與協會仍抱怨地方政府不願放權，政府相關部門仍掌控廠商的營業執照發放、專業技術認定、新產品開發、商品展示會的召開等，導致廠商看輕協會，只重視與政府建立關係。⁴⁰ 甚至有些廠商認為行業商會力量不足，無法真正解決廠商在市場中面對的困難，感覺加入行業商會用處不大。溫州許多中小企業覺得商會易於被同業中規模較大廠商所把持，成為它們與政府關係建立的通道。加上商會力量不足，很難真正約束同業之間的削價競爭，導致競爭能力較佳的中小企業質疑加入商會的效用。⁴¹ 縱使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商會與協會採取外向連結與開放包容的策略，吸收各種不同的組織成員，並使自己成為網絡核心或組織場域關鍵位置的制度企業家，擁有較多資訊、理念與知識庫存，主動協助地方政府經濟治理與政策執行，並推動地方制度創新與變遷，但商會與協會無意取代及超越政府。

3. 地方政府治理經濟的弱勢：地方私營經濟發展的制度互補

溫州市政府在經濟治理上的無所作爲，有時被美化為務實主義，因為地方集體資產薄弱，無法發展集體企業，只好採默許態度任由農民發展個體經營。與無錫鎮壓私營經濟不同，溫州地方政府只有在中央發起政治運動後才對私營家庭作坊進行政治打壓。溫州市政府在經濟領域的消極作為，無力插手地方經濟事務，並不表示在其他政策領域也同樣弱勢，畢竟政府治理能力的強弱在不同政策領域中表現不同 (Skocpol 1985)。尤其當地方政府與私營經濟產生正面衝突時，政府會為一己之利而犧牲私營企業。例如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央政府開始壓制私營經濟發展，面對全國大環境的政治壓力，溫州市政府害怕像過去一樣被指責為「走資派」，遂大力鼓吹股份合作制企

40 作者訪問過的溫州印刷協會與服裝商會都有同感。

41 作者 2008 年訪問溫州服裝業者、創投公司與家電業者。

業，以社會主義成分較高的股份合作制取代私營企業。當時溫州許多私營作坊與企業擔心這是另一波的合作化運動，不僅指責地方政府缺乏擔當，「只顧自己頭頂的烏紗帽，不顧老百姓死活」，私營業主紛紛關門避難。⁴² 溫州市政府認為提倡社會主義的股份合作制可以保護私營企業，但卻遭到民間反對與抗拒。值得注意的是，溫州市政府雖以股份合作制作為私營企業的政治掩護，但要求私營企業提取紅利時必須符合股份合作制規則，不得超過企業稅後利潤的 25%。⁴³ 可是領取股份合作制經營執照的私營企業，依然按照原有慣例行事，顯示私營企業的陽奉陰違十分普及。這反映出溫州地方政府經濟政策執行能力十分薄弱，尤其難以落實違背民間利益的中央政策。

溫州地方政府長期被財政收入不足所困，但卻必須如期完成上級政府下達的衆多政策指標，在毛統治年代即已如此，地方必須想辦法自籌經費，執行政策完成任務。此一「準計畫行政」體制的壓力在經濟轉型期間愈演愈烈(Liu 2012)，例如溫州在 1990 年代初期為響應上級都市發展政策，必須做都市建設與更新，但欠缺建設經費，各級政府部門為完成政策指標，不時向私營企業與個人募款甚至勒索，成為政府預算外財政收入來源。溫州衆多中小企業不時被地方政府各種名目的樂捐、攤派、集資等騷擾，生產外移遂成常態。在都市更新計畫中，溫州市政府將市區某些地段的拆遷更新，發包給民營建設公司去經營。在實際執行中，政府以低價做土地徵收，轉換為國有土地後，在土地市場中以高價拍賣，獲取土地增值的暴利，再與私人建設公司分享，因此民營建設公司在承包都市建設與更新中，獲得不少利潤。溫州市後來的各種基礎建設，包括機場、港口、鐵路、公路、下水道、垃圾回收場、水電設施、鄉鎮政府行政大樓建設等，如果不是向民間集資與攤派，就是由民營建設公司承包，多以土地拍賣方式取得建設經費（諸葛雋 2007: 232-233）。地方政府雖以公開方式徵收土地

42 作者於 1992 年初訪問溫州市與下轄的甌海縣，農村幹部與私營企業紛紛陳情對股份合作制的疑懼，認為這是走向集體經濟的倒退之路。

43 見溫州市人民政府(1987)〈關於農村股份合作制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

與拍賣，但其中作業晦暗不明，政府相關部門與建設公司，官官相護以及腐敗叢生，有些學者稱之為政府失靈（史晉川等 2002: 276-278）。

溫州發展路徑中，政府一向弱勢，又與地方企業鑲嵌不足，導致轉型策略失敗的批評，造成企業外移與資金外流的產業空洞化。根據溫州學者、退休幹部與私營業主，溫州之所以缺乏發展後勁，易於被其他地區追趕，在於溫州上層的政治領向來缺乏發展策略與遠見，無法在溫州私營經濟基礎上設計出適合溫州永續發展的道路，以致一任領導一個政策，甚至移植他處不適合溫州發展的策略，造成地方幹部與民間業者的壓力，顯現溫州地方政府治理經濟的弱勢與無能。⁴⁴也因為如此，溫州行業協會與商會趁勢而起，代理政府職能，協助地方中小企業解決困難。

溫州地方政府雖在經濟治理上弱勢，但也在 1990 年代末追隨中央政府倡導產業技術升級，鼓勵民間發展高科技產業，企圖推動地方產業結構轉型。但是企業技術升級與高科技產業發展，首先需要專業訓練的工程師與科技人才，可是溫州市政府只知高喊口號，不瞭解地方政府必須投資高等教育，設立大學與研究機構培養地方科技人才。溫州欠缺蘇南地方政府的魄力，以政府力量廣設專科學校，引進研究機構，培育技術人才。當技術能力無法支持地方科技產業發展之際，蘇南積極引進外商高科技產業，不僅冀望外商做技術轉移，而且指派地方培育的專業科技人才進入外資企業，學習科技產品的裝配製造，以此作為地方產業結構轉型的基礎。

此外，由於地方財政困窘，溫州也無法像無錫小康社會那樣，採取普及全民的養老年金與醫療保健政策。溫州難以將城鎮郊區農民的老人年金與健康保險納入政府福利體系，只能訴諸於市場取向的商業保險（劉雅靈 2009），導致溫州社會福利的普及率甚低。

44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民營企業家、任職私營部門的退休幹部、溫州大學與其他學校的學者、溫州商會與協會負責人等，他們均認為前任的市委書記企圖移植浙北「蕭山經驗」，強調港口等重大基礎建設、石化重工業發展、積極引進外商與外資等，而忽略溫州經濟基礎的私營中小企業，完全與地方發展路徑背道而馳。

總結來說，溫州在全國與地方市場競爭壓力下，採取技術升級作為回應手段，然而向來弱勢的地方政府轉型能力不足，不僅與企業鑲嵌程度不夠，也缺乏魄力培養地方技術人才，更遑論創造地方比較制度優勢來支持企業的在地生產。溫州地方政府在經濟治理上的弱勢，不僅是地方制度慣性的延續，也成為地方私營經濟繁榮的制度互補。也正因為如此，在弱勢地方政府的制度互補下，溫州商會與協會享有相對較高的自主性，建構外向連結與開放包容的成員網絡，以制度企業家角色協助弱勢的地方政府來維護市場秩序與經濟治理，推動制度變遷與防止市場失靈。但在近年國內外金融危機雙重衝擊下，縱使享有相對自主性較高的地方商會與協會，在缺乏支持私營經濟發展的金融改革政策與全國制度環境不利條件下，難以有效治理溫州資金市場中高利貸的猖獗。

（二）無錫的調適策略：從政府公司法人到混合市場經濟

無錫為因應市場競爭壓力，地方政府一向強勢領導，不僅強行介入經濟治理，並主動協調經濟交易，甚至取代市場機制的資源分配，導致無錫行業協會與商會的弱勢無能，必須依賴政府生存。無錫應對市場競爭的策略選擇如下：

第一，大力引進外資。無錫市政府擔心本地企業私有化之後，在短期內不利於無錫市的經濟產值表現與地方稅收，而且對江蘇省經濟產值貢獻也會下跌。為解決此一問題，無錫市政府在 1990 年代初模仿浦東開發區，在市、縣、鄉鎮各級政府建立不同行政級別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除國家級開發區外，計有 15 個省級開發區，積極引進外資，希望利用外資企業的生產與對外貿易，來創造經濟產值、貢獻地方稅收、增加就業機會、促進出口、轉移先進技術與管理方法，促進地方產業結構升級。⁴⁵ 目前無錫本地企業在國際生產鏈中仍處於底層，只做加工貿易，以廉價勞力貢獻生產，或為外資企業做代工出口。無

45 作者 2005 與 2009 年先後訪問無錫市新區管委會與惠山區經濟開發園區。

錫多數外資企業聚集於孤立隔離的經濟開發區(enclave economy)，尚未與本地企業建立綿密的生產網絡。縱使如此，已有少數本地企業開始為外資企業提供基本零組件生產、運輸、包裝等服務（祖強 2007）。無錫外資企業在 2006 年底就已占當地經濟產值 30%，而溫州在 2004 年只有 12%（楊衛澤 2007: 33；范從來、孫覃明 2007: 119）。在今日無錫工業產值中，三資企業⁴⁶占第一位，而且外資企業對無錫 GDP 成長的貢獻已超過國營企業。

第二，籌組企業集團與發行股票上市。縱使無錫地方政府在企業私有化過程中全面退出生產領域，但依計畫經濟的制度慣性，無錫對企業做大規模的政策偏好前後一致。無錫市政府鼓勵鄉鎮、國營、集體企業在私有化過程中籌組企業集團，透過複雜的資產剝離與財務重組，將不相干的企業強制拼湊而成企業集團，幫助它們做財務包裝，從股市汲取發展資金，增加企業存活率。然而以政治手段強行兼併企業，導致集團內部利益衝突不斷，缺乏經濟效益（劉雅靈、王信賢 2002）。與溫州私營企業相比，無錫企業規模的平均產值是溫州企業的三倍，在 2004 年比例為 10,070 萬元與 3,373 萬元（范從來、孫覃明 2007: 120）。無錫市政府又幫助新興企業集團進入國內外股市集資，到 2011 年底，無錫共有 74 個企業集團進入國內外股市（江南晚報 2011/12/20），而溫州只有 9 個私營企業集團進入國內股市，但沒有任何集團進入國際股市（中國證券網 2011/11/8）。不像無錫，溫州市政府少有介入企業集團的形成，也不會幫助它們進入股市，市政府將企業集團發展的機會讓給市場。但最近溫州在經歷高利貸風暴後，市政府已開始積極將地方私營企業推入股市，獲取企業發展所需資金。

第三，改採密集式成長策略。無錫在二十世紀末放棄快速成長的外延式發展策略，走向強調經濟效益的密集式成長，並鼓勵發展高科技產業、提高生產力、促進服務業發展、降低污染與廢棄物、促進地

46 一般對三資企業的理解，包括在中國投資的外商獨資企業、與本土廠商共同出資金的合資企業，以及本土廠商以土地、能源、勞力與廠房等入股，而外商以技術、資金等入股的合作企業。

方產業結構升級，並以達到小康社會的政策目標為優先。無錫市政府為推動高科技與高附加價值產業，積極向國際電子通訊產業招商，除國際資本外，也向內地招商，引進本地企業。⁴⁷招商重點在淘汰傳統高污染與高耗能的化工、印染、造紙等產業，企圖引進先進製造業中的電子資訊、汽車零件、生命科技等產業。為達到產業地理集聚效應，無錫各開發區鼓勵屬於同一生產鏈的上下游企業進入，降低交易成本與增加產業在國內外市場中的競爭力。此外，無錫各級地方政府均大力提倡服務業，包括軟體設計的承包、物流業與商場等的發展，⁴⁸如鼓勵溫州商人在無錫投資東方國際輕紡城。⁴⁹

不像溫州的資金外流，無錫本土企業很少外移，地方資本主要用於地方經濟發展。若地方企業對外投資，通常集中於生產原料與半成品的外地廠商，尋求貨源供應穩定。近年無錫企業界響應中央政府西部大開發政策，被無錫市政府動員到西部各省去投資，幫助西部做建設；無錫企業家也被動員到柬埔寨投資，建設當地工業開發區，並鼓勵國內出口企業遷到此地生產，以免受制於美國進口配額限制，這些均是響應無錫市政府政策目標的配合行為。⁵⁰

第四，城鎮建設與社會福利。無錫市為落實城市現代化的政策目標，致力於農村與城市總體規劃。市政府在長程發展計畫中欲將原有轄區內 6,785 個自然村撤除 6,435 個，不僅計劃將農民全數遷移到城鎮的農民安置房，改變農民戶口為城市居民，並且計劃將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福利延伸給新興城市居民的農民，包括退休養老金與健康保險。⁵¹無錫市政府將農民遷移後的農村土地，重新規劃為商業、綠地、公園與工業用地，尤其在工業用地上建立工業區，將農村中小企業聚集於其中，不僅控制污染，並增加土地使用效益。⁵²無錫市以政治強

47 作者 2009 年訪問無錫市惠山經濟開發區經濟發展局幹部。

48 作者 2009 年訪問無錫市發改委之下的服務業處與工業處官員。

49 作者 2007 年訪問在無錫成立的溫州商會。

50 作者 2009 年訪問無錫 Y 建設集團公司董事長。

51 作者 2005 年訪問無錫市國土資源局官員。

52 作者 2007 年訪問無錫市政府規劃局官員。

制手腕達成都市化目標，與世界各國在市場經濟導引下形成的都會發展截然不同。無錫市政府只打算保留 350 個自然村，呈現農村鄉野景觀，並以超乎實力的野心作都市景觀規劃，在財力不足情況下，宣稱要普及全民照顧，包括新興居民（原農民）的社會福利。

簡言之，無錫地方政府訴諸私有化、企業集團發展、吸引外資、追求密集成長、改變產業結構、規劃城鎮發展與全民福利，以這些應對策略回應日漸增強的全國與區域市場競爭，使無錫從原來的公司法人集體經濟，走向地方政府協調為主的混合市場經濟。無錫市政府所推動的策略選擇與制度變遷，並不足以使無錫成為發展型政府，⁵³ 反而無錫地方政府亦步亦趨的跟隨在中央政策之後，偏好做大企業規模，以市場寡占與壟斷照顧企業集團利潤、壓制私營經濟發展，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在財力不足情況下，無錫市政府責令農村承擔農民城市福利銜接的財務重任，將財政負擔轉移下級。換言之，無錫地方政府雖在經濟轉型中推動制度變遷，但以落實中央政策為目標，未見大膽的制度創新，走出自己獨特的發展路徑。

1. 無錫地方政府推動的經濟轉型：弱勢制度企業家

無錫市政府在 1990 年代中葉推行的企業私有化改革，是追隨中央政府的國營企業產權改革政策，並非地方獨特創舉。同理，無錫市政府積極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也是配合本世紀之初的中央政策。為達地方產業升級的政策目標，無錫市模仿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的大學研究機構，首先在市郊設立教育園區，建立技術專業學校，引進全國性研究機構的分支，並建立知名大學的分部，為本地科技產業培養人才。⁵⁴ 又為縮短科技產業發展的時間，無錫市積極引進外商科技企業，進入無錫市的經濟開發區，不僅希望形成產業地理群聚效果，而且帶動無錫本土零組件產業及服務業發展。⁵⁵ 然而許多探索產業地理群聚

53 發展型政府也就是西方學術界稱之的「發展型國家」，主要強調國家規劃與推動產業發展的能力(Johnson 1982)，也有學者強調國家與產業的「鑲嵌自主性」(Evans 1995)，或強調政府推動經濟成長的轉型能力(Weiss 1998)。

54 作者 2005 年訪問無錫新區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官員。

55 作者 2009 年訪問無錫市惠山區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下屬經濟發展局官員。

效應的學者，均認為產業之所以能形成群聚，除產業內部因生產分工形成中下游產業鏈的生產網絡外，群聚企業會緊密鑲嵌在地方制度、歷史與文化中，凝聚與強化企業生產網絡的信任、互惠與合作 (Hollingsworth and Boyer 1997)。但是外資聚集在開發區中，隔離於地方制度文化影響，又由於與本土企業間的技術差距，很難與之發展信任為基礎的生產網絡。雖然無錫市政府以產業地理群聚政策來推動科技產業發展，但以政治強制力量取代市場的硬性推動，政策效果難以實現，不僅無法落實產業與地方制度的鑲嵌，也難以使外資企業在地方生根。

無錫市政府同時展現城市發展與更新的魄力，重新規劃無錫都市更新與農村發展。與溫州的都市建設與更新相同，無錫市政府首先透過農村土地徵收與土地拍賣取得豐厚利潤，再按都市規劃藍圖進行大規模拆遷與建設。雖然無錫都市景觀與建築物分布較溫州整齊，但與溫州各級政府和民間財團共同分享土地暴利不同，無錫市政府不僅獨享土地增值暴利，而且壟斷都市更新與建設工程，圖利市政府部門下轄的建設公司。⁵⁶

隨著都市發展與擴張，無錫市企圖將轉變為城市居民戶口的農民納入城市福利保障體系，享有與城市居民等同的醫療保健與養老年金，達到小康社會的政策目標。然而無錫與溫州均呈現財政困窘，難以執行全民普及的福利照顧。但與溫州不同，無錫責令納入城市地界的農村與鄉鎮，承擔此一財政與福利重任，幫助市政府完成政策任務。⁵⁷ 但對偏遠且財力較弱的農村，無錫市實行「土地換社保」的做法。每當農村獲得農地徵用補償時，市政府將賠償金額直接匯入城市勞動社會保障局，作為農民重新註冊為居民時的福利銜接，不再將補償金交給農村或鄉鎮政府，以免基層政府轉挪他用。⁵⁸ 雖然無錫市居

56 作者 2005 年訪問無錫市 C 蔬果企業集團幹部。

57 作者 2005 年訪問無錫市北塘區 H 鎮 Liu 村支部書記與村主任，討論村民與城市居民福利銜接的財政支出。

58 作者 2005 年訪問無錫市國土資源局官員與下轄 H 鎮國土所幹部。

民享有社會福利的普及率高於溫州，但農村與城市的福利銜接以及農民安置房的分配補助做法，引發許多爭議與農民抗爭（陶逸駿 2008）。

無錫雖歷經產權私有化的轉型，然而在今日無錫市政府的優先發展策略中少見私營企業踪跡，多為各級政府偏向帶動科技產業發展的外資企業、本土大型股份制國營與集體企業，政府幹部對大型企業的偏好慣性，極為明顯。無錫各級政府在照顧外資企業與政府優先發展的大型股份企業之餘，似乎忘記本土極待扶持與發展順序排後的私營中小企業與私有化企業。尤其無錫市政府在追求密集成長策略下，過去依靠外延式發展的污染性企業成為政府的燙手山芋，難以處置。一位私營化工集團經理人談到：

我們原先是國營企業，但自從 2004 年全盤私有化之後，無錫市就不再重視我們的發展與需要，認為我們企業消耗過多電力，又容易製造廢氣污染。例如在 2005 年我們廠的氯氣意外洩漏，造成無錫市居民恐慌。我們化工集團急需土地，擴張產能，但市政府一直遲遲沒有回應，不批土地，也不決定化學工業園區要蓋在何處，使我們無所適從。難道我們變成私營股份企業，而且沒有列入政府的優先發展序列，就忽視我們？⁵⁹

無錫一位私營企業董事長談到無錫市政府對私營企業的觀感：

像我這樣原生型的私營企業，在無錫市是最不受重視的。無錫市向來就偏重大型國營與集體企業，提供企業發展所需的所有資源。縱使鄉鎮企業私有化之後，原有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仍維持住，企業有困難就找政府幫忙。照理講在推動私有

59 作者 2007 年訪問無錫市 G 化工集團公司。

化之後，無錫市就該照顧我們私營企業，給予扶持，可是與外資企業所受優惠相比，我們私營中小企業真是差遠了。我們中小企業在無錫提供絕大多數的就業機會，但政府就是忽視我們。⁶⁰

無錫在經濟轉型中偏袒外資與優先發展股份制大型國營與集體企業，提供它們所需的資源與優惠。尤其外資企業對當地財稅貢獻、出口創匯、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上獨當一面，不僅私營中小企業在銀行融資、土地取得、稅收優惠等方面，難以與之匹敵，⁶¹ 非優先發展的企業集團也受排擠。外資在無錫經濟體中所占比重遠大於溫州，無錫經濟成長果實遂被外資瓜分，這也是為何無錫經濟成長果實不像溫州那樣多被地方居民分享，導致無錫城鎮居民平均收入低於溫州。如果無錫不想被外界解讀為純粹依靠外資發展經濟，地方政府勢必要輔助地方民營企業成長。

無錫地方政府以制度企業家角色強勢干預地方經濟發展，但在實際做法上多追隨中央政策，延續地方制度慣性，偏袒並圖利大型國營與集體股份企業集團，造成市場競爭不公與私營中小企業不滿。無錫地方政府雖以經濟開發區作為高科技產業發展聚集區，可是並未建構外資與本土企業間生產網絡所需的制度支持，降低了政策落實效果。無錫與蘇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成果，來自強勢的地方比較制度優勢，以股份制集體與國營企業為主，並與弱勢的私營經濟作為制度互補，襯托出規模偏大的國營與集體股份企業集團聲勢。這表示形同弱勢制度企業家的地方政府，始終追隨中央政府政策，不僅創新不足，而且持續複製地方制度慣性。

2. 比較制度優勢：大規模國營與集體股份企業及其對政府依賴的慣性

在計畫經濟的制度慣性下，無錫地方政府偏好以大規模企業集團

60 作者 2007 年訪問無錫市私營 R 實業公司董事長。

61 作者 2007 年訪問無錫市發改委退休官員。

來應對市場的激烈競爭，集團通常採公司法人的組織架構，透過財務包裝，使母子公司之間交叉持股，並在地方政府輔助下爭取上市，獲得股市資金後進一步做大企業集團，同時負擔集團當中不良資產與非生產性債務。⁶² 為幫助這些政府扶持的股份制企業集團，無錫市政府允許它們寡占或壟斷地方市場，保證它們的獲利。無錫許多企業集團生產具壟斷性的化學與機械產品，例如無錫 WF 集團中的 W 公司與德國 Bosch 技術合作，生產汽車廢氣淨化器的技術領先全國，因此幾乎寡占甚至壟斷無錫汽車淨化器市場。⁶³ 又如無錫 C 蔬果集團公司前身為國營企業，私有化後除維持在無錫寡占性的蔬菜水果供應，還經營連鎖超市、便利商店、醬菜製造等。它不僅採購無錫本地蔬果，更與全國蔬菜水果基地簽約，包辦當地蔬果採購，遠至新疆地區。⁶⁴

無錫企業從開始便與政府關係密切，縱使施行產權私有化切斷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但企業遇有問題與困難，仍然回頭尋求政府幫助，深怕在私有化後被政府拋棄。無錫企業家似乎缺乏溫州企業家那種勇於學習與開創的精神去應付市場挑戰，前述的無錫私營企業家曾經抱怨政府只重視大企業而忽略中小企業需求，但他卻靠政治關係幾乎壟斷政府公安部門的汽車檢測：

中國政府為求汽車安全，要求每輛汽車每年都要做汽車安全檢測，由公安系統壟斷安全檢測，以此保證公安系統的費用收取。我生產積動車安全檢測設備，成本只需幾萬元人民幣，但附加價值高，一套設備賣給公安系統 45 萬元。我花了三年時間與公安部門洽商，在他們同意購買後我才做檢測設備的研發，他們使用後發覺我的設備好用，我才打開市

62 作者 2007 年訪問無錫 G 化工集團公司與 W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在企業集團成立過程中，地方政府以行政命令將一些經營虧損、欠債倒閉的國營與集體企業，強硬塞進集團公司，並勒令集團公司從股市中取得資金幫助這些虧損企業償還債務，並負責原有職工轉業等，形成集團中不良資產與非生產性債務。

63 作者 2007 年訪問無錫 W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64 作者 2007 年訪問無錫 C 蔬果集團公司董事長。

場。目前我的產品約占全國市場的 1/3，一年營業額超過一千多萬元。⁶⁵

由此可見私營業主也必須與政府部門建立良好關係，才能得到後者的訂單，而且政府是唯一的客戶。

在無錫流通領域的H家具大賣場，像開設百貨公司一樣，吸引許多家具廠商進駐。根據此賣場負責人：

我們H家具大賣場發源於常州，業務擴大後到無錫做投資。我們與瑞典Ikea家具店做策略聯盟，相互幫助，兩店比鄰而居，用物以類聚為號召，吸引顧客上門。我們在做投資前先選中某一城市，再在市區中尋覓最佳地點，購置土地，做大賣場建設，招呼Ikea建在我們旁邊。如果一個城市已經有Ikea或是美商Home Depot，我們就想盡辦法搬到它們旁邊去。我們賣場建好之後，將攤位出租給家具行，收取租金，這才是我們的利潤來源。因為賣場地點重要，因此我們必須和當地市政府打好關係，才容易得到我們想要的地段。⁶⁶

綜觀無錫的企業經營精神，企業家依賴政府的制度慣性衍生自計畫經濟時期，縱使無錫在1990年代推動私有化，政府不願再為企業背負財務重擔，但兩者間的關係藕斷絲連，無法完全切割（鄭傑憶2000）。一方面企業擔心被政府拋棄，另方面政府仍然繼續干預重點企業的發展，例如無錫上市的集團公司都是在政府幫助輔導下而成立。無錫企業家，不論私營或國營，幾乎都靠市場壟斷或寡占賺取利潤，要達到此一目標，企業必須主動與政府建立親密關係，取得政府的合作，企業生存才得到保障。對照之下，溫州中小企業自始就在市

65 作者2007年訪問無錫市私營R實業公司董事長。

66 作者2007年訪問無錫市H家具大賣場總經理。

場中單打獨鬥，獲得求生本領。雖然溫州企業也必須與政府建立關係，得到政府支持與保護，但政府的消極與被動，造就出溫州企業家的獨立、創新與變通。溫州企業集團數目不多，母子公司之間組織關係鬆散，縱使有交叉持股，垂直整合度低，而且子公司自主性較高。無錫企業集團中母子公司之間的監督關係嚴謹，垂直整合度較高，母公司對子公司下達生產與利潤指標，責令子公司完成，如同計畫經濟下的生產指標，具有強制約束力。⁶⁷ 也因為如此，無錫企業家偏向唯命是從，強烈依賴上級，成為政府偏袒的最愛。

3. 地方行業商會、協會的弱勢制度互補

無錫行業商會與協會向來從屬地方政府，甚至商會會長多由政府任命，而非商會會員選舉產生。無錫商會缺乏自主性與自治能力，如同政府的附屬單位，幫助政府完成政策指標，聽命政府辦事。雖然無錫商會與協會已於 2005 年開始脫離政府的資源輸送，遷出相應政府單位的辦公室，但仍然與政府關係密切，成為政府施政的傳聲筒；許多政府部門甚至仍然不願釋出管轄行業協會的權力，交由地方工商聯接管。⁶⁸ 相較於溫州商會的豐富資源、外向連結與高度自主性，無錫商會與協會規模小、資源少、力量薄弱，少有向外拓展的會員。無錫許多企業在私有化轉型中雖然切斷與政府的產權關係，然而當企業發生問題時，仍然回頭找政府，鮮少透過協會與商會幫忙，甚至同業廠商都不願加入商會或協會，不僅參與率低，而且認為加入商會無用，反映無錫商會的弱勢。⁶⁹ 因為力量薄弱，很難承擔重務與責任，更無法幫助企業會員解決困難，無錫商會與協會常被當地企業譏笑為政府的附庸。雖然無錫商會與協會的上級主管——工商聯——幫助成立小額擔保公司，為中小企業尋求融資貸款，但與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

67 作者 2007 年訪問無錫市重要大型企業集團的總經理與董事長，訪談有關企業集團內部的組織管理。

68 作者 2009 年訪問無錫工商聯負責人。

69 作者 2005 年訪問無錫家具行業商會時，會員只有 125 個，顯示家具業者參與商會比例極低，經費來源過於薄弱，使商會無法提供會員有效服務；無錫民營經濟和民間組織研究所的一位學者也證實此一觀點。

會不同，無錫工商聯缺乏外向網絡連結，欠缺資訊與財務實力，使銀行承擔過多貸款風險，導致小額擔保公司無法持續，轉而投資上海房地產，失去原有功能與性質變調。⁷⁰

無錫市許多商會會長均認為，無錫地方政府控制過強，管理的事務過多，造成商會無能。根據無錫建設商會負責人：

無錫建設商會始於 2001 年，我們商會的功能是初級的，非常弱勢，因為中國政府功能過於強大，未將許多管理權限讓出，我們建設商會只是幫助政府做協調。建設商會雖是民間一級財團法人，但對我們的意義不大，因為無錫市政府建設局下面有建設協會，它是官辦的，而且是政府退休幹部的落腳處。建設協會應該要與政府脫勾，可是它們仍享有權力，成為二政府。我們建設商會完全是民辦的，會員有 60 多家，入會是自願的，但我們實力有限。⁷¹

無錫建商為了和政府掌控的建設協會打對台，幾家私營建設公司遂出面組織建設商會，擺脫官方的控制。縱使建設商會的民辦性質，自主性較高，而且建商老闆們財力雄厚，建設商會仍然相對勢弱，無法與政府機關及建設協會抗衡。相較於享有較高自主性的溫州商會能推動地方經濟轉型與制度變遷，無錫商會在地方政府強大控制下，黯然失色，難以擔負或協調地方市場經濟轉型的重任。

四、結論

溫州與無錫均為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的先行者，經歷三十餘年的市場經濟發展，在日漸激烈的市場競爭挑戰下，溫州已逐漸脫離早先

70 作者 2009 年訪問無錫工商聯負責人。

71 作者 2005 年訪問無錫市建設商會。

割喉式競爭的準自由市場經濟，並在地方政府無爲而治的制度互補下，走向地方商會協調爲主的市場經濟，而無錫也跳脫地方政府所有者的公司法人以及政府主導的外延擴大成長模式，轉變爲地方政府協調爲主的混合市場經濟，並採行強調經濟效益的密集式成長。

在溫州與無錫的經濟轉型與制度變遷中，溫州以其既有的比較制度優勢：私營中小企業靈活的經營手腕、快速學習的精神、獨立於政府的大膽創新，來回應激烈的市場競爭。在無所作爲的地方政府放任默許下，溫州私營企業得到開放發展空間。也因爲弱勢地方政府的制度互補，面對市場失靈的束手無策，導致地方行業商會與協會展現制度企業家的強勢，不僅規範同業成員的生產、行銷與競爭，並輔助地方政府的經濟治理與改善市場競爭中的失序，成爲溫州經濟轉型中新興的制度元素。相較之下，無錫雖已完成產權私有化改革，切斷政府與企業的產權關係，但大型股份制國營與集體企業仍展現地方比較制度優勢，繼續成爲地方政府扶持的寵兒。透過弱勢私營經濟的制度互補，更凸顯無錫股份制國營、集體企業集團的強勢。無錫地方政府仍維持一貫制度企業家的角色，前後採取不同的發展策略與新制度理念主導地方經濟轉型，卻始終跟隨中央政府腳步，少有大膽超越的創新之處，強勢的地方政府反倒顯現弱勢的蕭規曹隨。

溫州與無錫的經濟轉型沿著地方既有制度軌跡前進，雖然兩地回應市場競爭的策略選擇，受到各自的比較制度優勢、制度互補與制度企業家的形塑與約制，但溫州與無錫的制度變遷中出現保留舊制度元素與引進新制度元素，已經超越東歐國家制度變遷中舊制度元素的重新組合與手工修補特色，而呈現新舊制度元素相互覆蓋混合的層疊交替特性。

中國市場經濟轉型雖已步入資本主義體制而難以反轉，但在討論中國市場經濟轉型特性時，有學者認爲中國在 1980 年代的經濟改革最爲開放，不僅扶持農村私營經濟發展，而且容忍許多由下而上的自由化改革，以農村企業經營的資本主義(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創造中國 1980 年代的經濟奇蹟。但 1990 年代以後中國開始反轉之前農村

自由化的做法，不僅壓制私營經濟發展，而且走向國家領導的資本主義體制(state-led capitalism) (Huang 2008; Baumol et al. 2007)，甚至美國國會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 (*The New York Times* 2011/11/15)。⁷² 縱使在本世紀初，胡溫領導體制意圖恢復 1980 年代的自由經濟，並企圖改善日益擴大的城鄉收入與福利差距，但國家干預與領導的資本主義制度環境改變不大。

溫州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始於 1980 年代初期且從未間斷，導致溫州民間互助標會與地下錢莊應運而生，取代正式制度的國家銀行，幫助中小企業取得周轉資金。然而中央政府在 1990 年代改採政府主導的發展策略，大制度環境丕變，不僅壓制私營企業發展，同時優惠外資與大型國營、集體股份企業。在此期間中國金融體制雖已進行多次改革，也容許少數有政治關係的私人銀行試點經營，但小規模的民間金融業務是被嚴格禁止的。溫州民間游資雖然充裕，但在大制度環境不利私營企業發展下，轉向投機性的房地產、股市與能源礦產等領域，可是溫州中小企業資金周轉的困難持續複製。雖然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努力為地方小額貸款與融資公司爭取金融貸款服務，但缺乏大制度環境的支持，難有進展。一旦遭遇國際金融海嘯或國內銀根緊縮，溫州地下金融市場即被高利貸席捲。在金融市場失靈局面下，溫州企業主失踪，或在高利貸逼壓下走上絕路。縱使溫州私營企業有靈活經營的比較制度優勢，但缺乏制度互補的金融市場支持，造成發展缺陷。

相較之下，中國國家領導的資本主義體系對無錫經濟發展較為友善，無錫政府也始終追隨中央政府，在調適市場競爭所採取的各種應對策略上，亦步亦趨緊隨中央政府之後。無錫地方政府偏好大規模企

72 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這則新聞(Monetary Fund Urges China to Ease State Controls on Banking)報導，美國國會設立的中美經濟與安全評論委員會(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在 2011 年 11 月呈遞美國國會報告時，批評中國政府追求「國家資本主義」。甚至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警告中國政府，過嚴管制國家銀行與金融體系將會妨害經濟成長。在這之前，紐約時報(2011/7/6)在報導中國經濟發展時就以國家資本主義稱之。

業、給予各種優惠待遇、幫助占有市場，是計畫經濟與地方制度慣性的延續。爲了吸引外資高科技產業，無錫地方政府提供稅收、土地、能源等優惠，使備受歧視、壓制的私營中小企業爲之氣結。無錫中小企業必須在壓縮的空間中自謀生路，地方行業商會與協會在地方政府主導下也成爲弱勢附屬，但也因此使無錫不會發生像溫州那樣激烈的產品或金融市場失靈現象。從地方比較制度優勢與制度互補觀察，無錫顯然是國家領導資本主義體制的翻版，地方 GDP 快速持續成長，但個人平均所得卻落後於私營經濟發展的溫州。

溫州與無錫在經濟轉型的制度變遷中，兩地不同的比較制度優勢與制度互補，均局限制度企業家的策略選擇，以不同的調適策略來回應兩地所面對相同的市場競爭與金融危機，因而兩地走向不同的市場轉型路徑，複製與延續地方制度的分歧。雖然中央政府已在 2006 年釋出對私營經濟友善的策略，並鼓勵私營企業發展，但在缺乏配合私營經濟發展的金融制度條件下，中小企業迫切需要的資金周轉仍難以解決。縱使溫州 GDP 的成長持續轉換爲民間個人收入的增加，但中小企業發展的結構制約無法突破，溫州地下金融勢必猖獗而難以壓制，國際金融風暴與國內銀根緊縮會一再複製溫州金融市場的失靈，也將持續複製無錫經濟的短期得利與溫州經濟的長期失利。

誌謝：作者感謝《台灣社會學》兩位匿名審查者與編委會提供的修改建議，並感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提供的研究補助(NSC95-2420-H-004-050-MY3)。本文草稿曾發表於「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國立政治大學，台北木柵，2009/11/28），部分內容曾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坊」（2009/2/17）。作者感謝邢幼田、吳介民、陳明祺、鄭志鵬等教授與參與同學提供的寶貴意見，作者一併感謝本研究案助理黃騏弘的資料蒐集協助，以及《台灣社會學》編輯謝麗玲小姐的細心協助與編輯校正，同時感謝在大陸田野調查期間所有受訪者的協助。

附錄 江蘇省、浙江省各地級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江蘇省：

南京統計局 <http://www.njtj.gov.cn/>

南通統計局 <http://tjj.nantong.gov.cn/>

徐州統計局 <http://tjj.xz.gov.cn/>

泰州統計局 http://xxgk.taizhou.gov.cn/xxgk_public/jcms_files/jcms1/web61/site/index.html

宿遷統計局 <http://tjj.suqian.gov.cn/>

常州統計局 <http://www.cztjj.gov.cn/>

淮安統計局 <http://tjj.huaian.gov.cn/>

連雲港統計局 <http://tjj.lyg.gov.cn/>

揚州統計局 <http://tjj.yangzhou.gov.cn/>

無錫統計局 <http://www.wxtj.gov.cn/>

鎮江統計局 <http://tjj.zhenjiang.gov.cn/>

蘇州統計局 <http://www.sztjj.gov.cn/>

鹽城統計局 <http://www.yctj.gov.cn/>

浙江省：

台州統計局 <http://www.tzstats.gov.cn/>

舟山統計局 <http://www.zstj.net/>

杭州統計局 <http://www.hzstats.gov.cn/web/>

金華統計局 <http://www.jhstats.gov.cn/>

紹興統計局 <http://www.sxstats.gov.cn/>

湖州統計局 <http://tjj.huzhou.gov.cn/>

溫州統計局 <http://www.wzstats.gov.cn/>

嘉興統計局 <http://www.jxstats.gov.cn/web/Default.aspx>

寧波統計局 <http://www.nbstats.gov.cn/>

麗水統計局 <http://tjj.lishui.gov.cn/>

衢州統計局 <http://stats.qz.gov.cn/>

參考文獻

- 中國國家統計局(2001-2010)全國年度統計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gb>
- 中國時報(2011)高利貸害慘溫州 溫州老闆跑路潮。9月27日。
- (2011)救溫州倒閉潮 溫家寶遭批「馬後砲」。10月6日。
- 中國統計信息網(2010)[各城市]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http://www.tjcn.org/tjgb/201103/18159.html>
- 中國新聞周刊(2006)珍惜溫州旗幟。<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60519/14462582026.shtml>
- 中國證券網(2011)強盟股份擬中小板 IPO 溫州掀企業"上市潮"。中國經濟網, 11月8日, http://big5.ce.cn/gate/big5/finance.ce.cn/rolling/201111/08/t20111108_16667262.shtml
- 史晉川、金祥榮、趙偉、羅衛東等(2002)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溫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申俊喜、蔣伏心(2007)分報告4：創新引領蘇南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見楊衛澤、洪銀興編，創新蘇南模式研究：無錫的實踐與探索，頁128-171。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朱康對(2008)溫州發展形勢分析與展望。見金浩、王春光編，溫州藍皮書：2008年溫州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頁22-3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江南晚報(2011)又有兩家科技股上市無錫上市企業高達74家。新華網無錫頻道，12月20日，http://wx.xinhuanet.com/2011-12/20/content_24371186.htm
- 吳柏均(1995)中國經濟發展的區域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 周德文(2007)努力為實現溫州第三次跨越做貢獻。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2007年年會工作報告。浙江：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
- 金浩、王春光編(2008)溫州藍皮書：2008年溫州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保育均(2006)中國商會的現狀和發展方向。見浦文昌編，建設民間商會：「市場經濟與民間商會」理論研討會論文集，頁25-29。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 洪銀興(2005)以制度和秩序駕馭市場經濟：經濟轉型階段的市場秩序建設。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7)總報告1：蘇南模式的演進及其對創新發展模式的啓示。見楊衛澤、洪銀興編，創新蘇南模式研究：無錫的實踐與探索，頁1-18。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范從來、孫覃明(2007)分報告 3：新蘇南模式的所有制結構。見楊衛澤、洪銀興編，創新蘇南模式研究：無錫的實踐與探索，頁 97-127。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郁建興等著(2006)民間商會與地方政府——基於浙江省溫州市的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浦文昌(2006)溫州民間商會的新發展——溫州商會行業協會考察報告。見浦文昌編，建設民間商會：「市場經濟與民間商會」理論研討會論文集，頁 350-356。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祖強(2007)「新蘇南模式」與開放型經濟。見黃文虎、王慶五等著，新蘇南模式：科學發展觀引領下的全面小康之路，頁 147-165。北京：人民出版社。

張弘遠(2006)從失序市場到有序市場：中介組織與市場規範——以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為例。政治學報 41: 81-107。

陳耀興(2007)分報告 10：無錫創新發展模式的探索和實踐，見楊衛澤、洪銀興編，創新蘇南模式研究：無錫的實踐與探索，頁 357-384。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陶逸駿(2008)經濟轉型下的產權耗損——中國農村徵地協商案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安玉(2007)傳承與超越：從「蘇南模式」到「新蘇南模式」。見黃文虎、王慶五等著，新蘇南模式：科學發展觀引領下的全面小康之路，頁 43-73。北京：人民出版社。

無錫市統計局(2001-2010)無錫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wxjt.gov.cn/tjxx/tjgb/index.shtml>

黃勝平、湯可可(2005)無錫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研究總報告。見黃勝平、湯可可主編，無錫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探索，頁 14-36。北京：紅旗出版社。

楊衛澤(2007)總報告 2：貫徹科學發展觀推動蘇南模式創新發展。見楊衛澤、洪銀興編，創新蘇南模式研究：無錫的實踐與探索，頁 19-47。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溫州市人民政府(1987)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溫政[87]79 號。<http://www.wzcts.com/msg.php?id=376>

溫州市統計局(2001-2010)溫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wzstats.gov.cn/pageall.asp?id=7>

溫州年鑑 2003、2004、2005、2007。北京：方志出版社。

經濟觀察報(2011)溫州面臨「產業空心化」。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0-09/13/content_20884298.htm

葉培紅、張錦春(2002)溫州鞋業發展的第三推動力。見高波、張錦春編，溫州——

- 中國鞋都，頁 75-83。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 劉雅靈(2001)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蘇南吳江經濟興衰的歷史過程。台灣社會學刊 26: 1-54。
- (2009)中國都市化過程中新興的「農民收租階級」：溫州與無錫「城中村」的轉型路徑、集體抗爭與福利政策。台灣社會學 18: 5-41。
- 劉雅靈、王信賢(2002)缺乏發展的增長：中國大陸股票市場的制度內捲化。中國大陸研究 45(4): 43-74。
- 課題組(2008)溫州發展形勢分析與展望。見金浩、王春光編，溫州藍皮書：2008年溫州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頁 1-2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諸葛雋(2007)民間金融：基於溫州的探索。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鄭傑憶(2000)「藕斷絲連」：中國鄉鎮集體企業所有制改革前後政府與企業關係。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嚴克勤、湯可可等(2003)無錫近代企業和企業家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Baumol, William, Robert E. Litan, and Carl J. Schramm (2007) *Good Capitalism, Bad Capit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John L. (2004)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Maggio, Paul (1988)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Pp. 3-21 in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edited by Lynne G. Zucker.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Evans, Peter (1995) *The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eter, and David Soskice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Pp. 1-68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edited by 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cke, Bob, Martin Rhodes, and Market Thatcher (2007) Introduction: Beyo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Pp. 3-38 in *Beyo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Conflict, Contradictions, and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European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llingsworth, J. Rogers (2002) Social Systems of Production and Beyond. Pp. 239-252 in *Advancing Socio-Economics: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J. Rogers

- Hollingsworth, Karl H. Muller, Ellen Jane Hollingsworth.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Hollingsworth, J. Rogers, and Robert Boyer (1997)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Actors and Social Systems of Production. Pp. 1-47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edited by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Yasheng (2008)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 Guozhong (2004) On the Provincial Trade Barriers. *Journal of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5): 49-53.
-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i, Ming, and Jingbo Liu (2005) Difang Baohuzhuyu han Diqujian Maoyi Bilei de Jiyanxing Fenxi (The Analysis on the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Trade Barriers among Region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2(1): 92-100.
- Li, Bingqiang (2008) Inter-provincial Trade, Economic Status,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Journal of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6(1): 18-21.
- Liu, Yia-Ling (1992)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130: 293-316.
- (2012) From Predator to Debtor: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the Semi-Planned Administration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forthcoming). DOI: 10.1177/0097700411432674. <http://cmx.sagepub.com/content/early/recent>
- Mahoney, James, and Kathleen Thelen (2010) 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Pp. 1-37 i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edited by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i, Jean C.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1): 99-126.
- (1999)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ncet, Sandra (2005) A Fragmented China: Measur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Disinteg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3): 409-430.
- Skocpol, Theda (1985)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Pp. 3-37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Evans, Peter B.,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ark, David, and Laszlo Bruszt (1998)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 Economist (2011) Becoming Number One. September 24.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28987>
- The New York Times (2011) Monetary Fund Urges China to Ease State Controls on Banking. November 15.
- (2011) Building Boom in China Stirs Fears of Debt Overload. July 6.
- Time (2011) When Wenzhou Sneezes. November 28.
- Weiss, Linda (1998)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Zhao, Yongliang, Yong Xu, and Gueifu Su (2008) Trade Barriers among Regions and Its Marginal Effect. *World Economy* 2: 17-29.